

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反对“中帝论”的错误思想
——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问题讨论集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编辑整理

2018年8月

目录

编者按	2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4
简单说说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26
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31
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	73
谈“中帝论”破产了，还是“中帝”破产了	80
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	86
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	91
孤胆精英还是人民英雄？	111
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	117
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	130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135
“贸易战从何而来”编者按	141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糟点”	143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146
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	151
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155

编者按

这部文集收录的文章来自红色中国网、红旗网、激流网、无产者评论、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等进步网站。2017年至2018年，在中国马列毛左派内部，发生了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策略问题的争论。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是否即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影响。

“中帝论”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有资本垄断集团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集团，新兴的“中华帝国主义”正在同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并且逐步占上风。虽然“中帝论”者在口头上期待“中国工人阶级崛起”、“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们拒绝说明，如果他们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合乎事实，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怎样才能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资产阶级怎样才能由强变弱，无产阶级怎样才能由弱变强。虽然“中帝论”者在口头上重复“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更多地是资产阶级可以任意利用来解决自身矛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因此，无论“中帝论”者在口头上如何“革命”与激进，他们在事实上都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而是将其束之高阁或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种“中帝论”，实际上是在大量小资产阶级分子投机马列毛进步事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在马列毛左派队伍内部的反映。在这部文集中，话实、和尚、何宇等是“中帝论”错误思想的主要代表。

在这次论战中，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毛经天等同志对“中帝论”的错误思想做了批判。这些同志主张，中国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有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造成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以及无产阶级由弱变强、资产阶级由强变弱的条件，这种变化持续下去，最终将造成两大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根本变化，从而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这些同志指出，如果坚持“中帝论”的立场，那么就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必然性。只有抛弃“中帝论”的错误立场，踏

踏实实地努力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矛盾，了解中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才能树立革命信心，为进步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和巩固的基础。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作者：井冈山卫士（2018年6月，红色中国网）

前言

为什么“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减关税，降门槛，买美货，交罚款，美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

为什么“敢打必胜”的中国还要被一再羞辱？印兵进，美舰来，撤导弹，吃“萨德”，别国做什么中国承受什么。

为什么看似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维权老兵，恐吓不了进步青年，惩办不了讨薪教师，打压不倒罢工司机？

一句话，为什么近年来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

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梳理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行为。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立场。

（一）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

“贸易战”并未“战”，只是中国在做单方面的妥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束手就擒的指导思想。从2018年3月底到4月初，每当特朗普集团提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进行调查之时，中国商务部总会在口头上做出与美方对等的关税威胁。同时，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也集中表达了诸如“中国不怕打贸易战”，“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等较为强硬的声音。但这种僵持局面被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的讲话打破。在讲话中，习近平承诺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资利益，强化知识产权，降低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即在原则上答应了美方的所有要求，也冻结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手段。作为纲领性文件，习近平的讲话为后续谈判中的中国官方定下了基调，即答应美国的要求，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这也无怪乎中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基本服从美方好恶。

“种啥买啥”的进口策略。“贸易战”尚未开打之前，中国就向美国下了37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强化了美国在中国大飞机市场的地位；博鳌讲话之后，中国又主动降低汽车关税，向美国汽车敞开大门；5月底，中美贸易协定又规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能源。美国完全达成了其“减少逆差”的谈判目标，以至于特朗普在推特上兴奋地宣布“中国将从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手里进货，我们种多少他们就买多少！”。特朗普集团所依靠的传统工业、农业和能源资本家的利益全都得到了保障，以至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搞贸易摩擦的资本集团也被中国的妥协态度所震惊，一时阵脚大乱，降低了对特朗普集团的指责力度。

门户洞开的金融改革。博鳌讲话之后，人民银行第二天就宣布“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中国公司；今年年底前，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同时宣布了降低银行和保险业市场准入等措施。此举威胁到国家金融主权，降低货币政策效率，同时，美国并未做出对等妥协，反而在中国对美投资领域上屡屡设限。

唯唯诺诺的产权立法。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知识产权是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劳动力、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手段。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

加强中国对美国的剩余劳动净输出，将中国进一步锁定在为美国核心国家免费贡献剩余劳动的半外围地位。

败事有余的谈判表现。为修宪和连任寻求支持，也为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灭火，后来担任副总理的刘鹤在今年二月底访问美国。为表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诚意，中国在刘鹤抵美的当天就取消了对美国鸡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刘鹤在谈判中提出了“加大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准入、包括允许外企进入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措施”。不过，美方并不领情，特朗普不仅没有会见刘鹤，还在谈判当天就宣布了对钢铁征收 25%、对铝材征收 10%关税的决定。刘鹤无功而返。在博鳌讲话和中国释放出大量妥协信息后，美国贸易代表团五月初访华。他们丝毫没有给中国资产阶级面子，美方的谈判要求中包括：两年内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2000 亿美元；废止“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国立即采取可核查（当然是让美国核查——作者注）的措施停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停止所有报复行动并不会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在特定领域投资的限制；降低关税并且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等。这些条件，尤其是美国自由报复中国而中国不能反抗的羞辱性条款在人民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并未直接答应，美国贸易代表团也提前返回，朝野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刘鹤五月中旬赴美谈判的结果却是，除了侮辱性条款以外，中国原则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而刘鹤本人和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却把中美共同声明形容为“双赢选择”甚至“共同胜利”。不到十天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无视刘鹤的“双赢”声明，再次宣布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和强化中国在美国投资限制。面对完全没把自己当回事的美国政府，中国资产阶级颜面丢尽，人民群众情绪激愤，海外中文论坛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表现嘘声一片。环球时报删除了自己对此事的报道，只留下了商务部语无伦次的声明：“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价值 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国资产阶级终于做出一副如梦初醒状，做出对等加税宣告。但是双方加税措施都要到 7 月生效，而根据各方消息，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又要派出王岐山去美国灭火。至于王岐山能谈出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今年四月至六月间，中国资产阶级前倨后恭的姿态已经令许多民众对王岐山赴美谈判不抱幻想。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至于具体为何如此，我将在文章第二部分予以解答。

（二）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

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

早在2017年，中兴就因为向伊朗等国出口美国部件而接受了8.9亿美元的罚款。2018年4月16日，可能是受博鳌讲话中“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等措施的鼓舞，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中兴与美国有关的业务。

面对处罚，中兴这位“帝国先锋”又干了些什么呢？4月20日中兴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学习欧美法规，还必须拿到满分。5月6日，中兴通讯表示已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暂停执行拒绝令。5月9日，中兴就宣布：“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如此引颈受戮的姿态确实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而更不够“帝国主义”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7日，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协议，缴纳罚款10亿美元，另交4亿美元由第三方托管；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并允许美方指派人员进入中兴团队监督执行状况等。

如果说在贸易谈判中，中国没有直接答应侮辱性条款还算有点“帝国气概”的话，这个被中兴一口答应的处罚措施则有浓厚的“辛丑”风味。当时中国答应了每名中国人赔偿列强一两白银（共计4.5亿），今日则是每人赔偿一美元（14亿）；当时清政府处决刚毅、徐桐等主战派，今日中兴管理层大换血；当时列强派兵进入中国监督赔款，今日美国派员监督处罚执行情况。

看来，这个帝国不过是“大清帝国”，这个中兴，充其量也就是“同治中兴”罢了。中兴如此，被称为“民族骄傲”的联想、华为又如何呢？联想自不必说，关于通信标准投票上

“外举不避仇”的商业壮举，联合百名资本家向全国舆论宣战的行为和一直以来的“贸工技”路线已经说明了其买办性质，更不必说明显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定价标准。华为的“民族性”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任正非 2012 实验室座谈会纪要》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的良心是这样看待“帝国争霸”所必需的基础材料行业的：“我们的优势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在硬件问题上，任总也颇有高见：“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实验，把关我们的产品质量”；任总也非常排斥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会阻碍华为战胜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不像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在扶持本土供应商问题上，任总的选择一如既往的高标准：“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扶起来的未必不是阿斗……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做好的选来干就行了”；任总似乎提前六年预感到了中兴的遭遇，因此提前为不平等条约开脱：“李鸿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理解这个结论”。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罚，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革、“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三）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

经济上的“帝国先锋”们糜烂至此，中国资产阶级近年来的地缘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首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对美国无底线的妥协。2015 年 10 月，面对美国宣布美军随时随地可能在中国南海执行任务的挑衅，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香山论坛上表示“即使涉及国家主权，也不轻言动用武力”。果然，2017 年 7 月，美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领海，并驶进岛礁 12 海里领海线。2018 年 5 月，刘鹤签署中美共同宣言后一周，美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 12 海里。同时，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面对逐渐升格的挑衅，中国资产阶级是如

何回应的呢？2018年6月5日，中国撤走了西沙永兴岛上的红旗-9地空导弹系统，对此中国国防部的解释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无需过度解读”。范副主席的话讲得很明白，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第二，在美国压力下出卖朝鲜。2016年至2017年间，为配合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也发布对朝制裁措施，包括拒绝从朝鲜进口矿物原料，主要是煤炭；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和火箭燃料。同时，中国还威胁朝鲜不再续约《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算不考虑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资产阶级背盟败约的行为也在国际上使中国陷入孤立，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传统盟国的对华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中国的背叛行为也使得朝鲜方面脱离中国影响，向美国靠拢，2018年6月的“金特会”就事实上将中国排除出了半岛和平进程之外。

第三，花拳绣腿的“一带一路”。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工程过度照顾中国承包商、腐败横行、担心经济主权被侵蚀、无法支付债务以及担心破坏环境等理由纷纷取消或推迟一带一路项目，或要求更改报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停滞在144亿至148亿美元之间，占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从未超过15%。在“金特会”美朝取得谈判成果、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逐渐削弱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当着中国领导的面公开宣布拒绝“一带一路”战略。至此，“一带一路”不仅早丢了里子，现在连面子也都保不住，不知道那些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无限强大的“大棋党”们要如何解释。

此外，中国资产阶级没能阻止印度军队占据中国领土，也没能阻止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从全局到局部，从经济到政治，中国资产阶级执行的是一条彻底的对外妥协投降之路。用汪洋和楼继伟二位先生的话讲：“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局“观。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不平等交换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三个：

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而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因此，核心国家的产品包含价值（无差别人类劳动）较少，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产品包含价值更多。故而国际贸易中核心国家事实上在剥削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剩余劳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

核心国家占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通过知识产权等方式强化技术和准入制度等的垄断。这种垄断主要被现有国际分工、市场份额、军事和地缘政治霸权等因素所巩固。核心国家由于占有了这些先进的生产资料和垄断了市场份额而占有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免费劳动，如专利费和品牌溢价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地主阶级，外围半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则类似于租地农场主，核心国家获得的垄断收入则相当于地租。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工组织较弱，环境保护较差，金融市场不完善，跨国公司可以规避诸如工伤赔偿、保险、教育、污染治理、金融监管和部分税收等成本，以低于当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价格支付工资。这种劳务外包、产业转移和金融投机的本质是剥夺性的原始积累，即以不可持续地压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破坏社会安全网络的方式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

对于外围半外围国家来讲，该国统治阶级对待上述三种途径的态度和政策决定了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国策。任何强化上述三种途径的政策，都会强化核心国家对本国剩余劳动的榨取，锁定本国外围或半外围地位，这是充当国际资本在华利益代理人的买办

资产阶级国策；任何对抗上述途径的政策，都会弱化核心国家对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尝试突破外围半外围地位，乃至改变世界体系格局。

中国资产阶级走的是哪一条国策呢？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准入标准，放任外国资本涌入高利润行业，会促进利润率平均化，为外国资本攫取剩余劳动创造条件，有利于第一途径和第三途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服从美国立法规则，会强化美国在技术和贸易规则上的垄断性，提高美国的垄断租金，有利于第二途径；缴纳罚款和接受惩罚性关税则是直接鼓励外国资本通过第三条途径来掠夺中国劳动人民，更何况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一切政策都指向强化中国的半外围地位，继续为核心国家提供剩余劳动，绝无挑战美国霸权、搞帝国主义争霸的“僭越”之心。

中国资产阶级为何会走妥协投降的路线呢？这要从世界体系中处在不同地位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特殊国情来讲起。

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享受着外围国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也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如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都是具备一定中端制造业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从外围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低端工业品，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尤其是材料、芯片和机床方面严重依赖核心国家。核心国家需要半外围国家提供的数量庞大（小国做不到）、质量尚可（外围国家做不到）、价格便宜（核心国家做不到）的工业制成品以满足跨国垄断资本家压低本国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维持高利润的贪婪欲望。半外围国家则需要核心国家提供军事保护，以提供安全的能源、原材料和制成品交通线，同时维持原料和能源产地秩序稳定。

就中美关系来讲，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工业品是美国资本主义得以一方面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豢养一部分“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据远航一号估算，中国每年免费向美国输出大约 5000 万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中国对美国的劳动净输出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并与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威胁共同作用，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打败工人阶级的物质力量。美国资产阶级少不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从中东、非洲和南美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在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低于 30%的情况

下，维持印度洋石油交通线、维持中东产油国政局稳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至关重要。中国海军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军队，就充当了“治安军”和“护镖队”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也需要美国。这是中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存在平白无故的“争霸”，也不会有毫无利益的妥协。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眼睛一直盯在利润率上，而一方出钱、一方出枪的合作当然比胡乱炫耀肌肉乃至真打起来的“争霸”有利得多。纵观四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对美关系的表述，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广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再到中美“夫妻关系”。两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即共同剥削两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维持利润率，确保资产阶级统治长治久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从外围国家获取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因而半外围国家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例如半外围国家的综合税率总是显著低于核心国家。相比起核心国家，它们的行政效率、社会稳定和镇压能力总是疲弱的。这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半外围国家政权机关孱弱**。半外围国家无力供养强大的暴力机关，因此其官僚系统，尤其是军警宪特组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现地自给”，即通过灰色手段直接从人民群众攫取资源。这会造成行政机关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腐败化自不必说，半外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不足以反映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又缺乏足够经费建立监督机制，因此权力寻租行为广泛存在，这表现为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卖官鬻爵、官商勾结等，例如卡车司机罢工时反映的警察乱罚款现象，就是地方专政机关人员重要的创收渠道；诸侯化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少，内部分配纷争严重，因此不同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会结成派系，这些派系的政治力量表现为对具体官职的控制，其经济基础往往是地方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家，在基层则是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当派系自身巩

固，其他派系乃至中央机关无法插手时，就会演变成诸侯式的独立王国。许多地区县委书记乃至村领导一手遮天的现象就是这种“诸侯化”的普遍反映。本世纪初，两广云贵地区自建武装的毒品村，就实质上具备了“中国小臣”的特点。诸侯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时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一般规则的程度。例如薄熙来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同属新自由主义阵营，已不存在任何“路线冲突”，但是各派系以“反腐”为名的倾轧烈度反而不断增强。由于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依附性特点，各派系的冲突往往需要核心国家统治阶级来仲裁，这一方面表现在各派系主要人物都有海外产业和存款，以便在派系斗争失败后跑路，如《巴拿马文件》所曝光的那样；另一方面，各派系也以相互曝光对手海外资产为乐事，如2017年的郭文贵事件。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倾轧以2018年初修宪为标志，达到一个小高潮，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派系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局；对于资产阶级某个小集团来说，其内部倾轧失败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本阶级统治失败的成本。这一方面授人以柄，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在与美国的国际纷争中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如“贸易战”中的无底线妥协）；另一方面某一派系遭难、其余派系看戏的状况也为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破局提供了时间窗口。非正式化则是中国阶级矛盾逐渐尖锐的产物。阶级矛盾越尖锐，无产阶级越有斗争经验和组织性，镇压的成本就越大。据“非新闻”统计，中国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近三万起，每天80起左右，比2014年增加34%。实际数字可能远大于此，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表示，2011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群体性事件高达500起。随着参与过群体性事件的民众数量增多，单位数量军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威慑能力逐渐减弱。至2015年，甘肃永昌县少女跳楼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示威群众与镇压军警数量已经接近一比一，以至于上级金昌市、周边武威市和兰州军区都不得不抽调军警前来支援。群众斗争性的增强使镇压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任务，只能以人力对人力。军警数量显然无法满足镇压需要，大举扩充军警队伍成本太高，因此除频繁抽调、疲于奔命外，不得不大量补充协警和临时工，乃至动员地方黑社会穿上制服维持治安。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队伍增加了镇压过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受群体性事件影响的资本家必须要给军警经济报酬才能买到镇压“服务”，镇压成了生意，军警成了私兵。这种非正规化破坏了军警在人民群众中的专业形象，以至于几乎每次军警出动，都会被民众质疑，

“你是为谁服务？”。军警的意识形态威慑功能已经烟消云散，在斗争性强的民众眼里，军警与自己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条枪而已。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的发展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速。它降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镇压力，巩固了基层事实上的自治状态，鼓励了地方潜藏着的离心倾向。封建王朝时期“皇权不下乡”的格局，正在以压倒个别领导人集权意志的必然性发展着。同时，一部分非正式和退役的军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甚于与专政机关的联系。可以说，阶级斗争是革命的预备学校，今天的抗议群众、昨天的协警老兵，都是未来革命大军的预备队。

第二，半外围国家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已占到所有劳动力的60%以上。由于农村产业后备军逐渐减少，城镇净增就业人口已成停滞之势，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加强，另一方面斗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围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数量少、比例低，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因而难以组织强大的工人运动。核心国家由于有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并无广泛迫切的斗争需要。半外围国家的斗争土壤是得天独厚的。由于要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的手段，不得不频繁地使用武力镇压。而领教了军警手段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很快明白了只要斗争成功，“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比如2018年6月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就不再满足于拉横幅请愿、呼吁统治阶级满足诉求，而是以直接堵塞运输交通线、盘查过路司机、扣押罢工叛徒的方式逼迫资产阶级做出反应。中国无产阶级斗争走在了幻想“议会模式”包打天下的小资知识分子前面，也走在了部分认为“中华帝国蒸蒸日上，无产阶级只能挣扎”的左翼人士前面。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许多青年学生也在思考为何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这构成了小资产阶级中左翼进步思潮的阶级基础。一部分学生则投入了帮扶工农、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例如，2017年底被番禺公安非法拘押和追逃的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就因为服务工人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在解救“八青年”的过程中，各地工农进步群众也广泛参与进来，在“八青年关注团”中的比例显著超过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交流融合，逐渐打破了知识分

子“不接地气”、革命群众“不达天听”的分裂局面。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正在朝着行业联动、全国支援、工农学结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能源危机浮上水面**。如上文提到，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不到 30%，同时石油产量正在下跌。由于人民群众反雾霾、反污染的斗争，煤炭的开采使用受到遏制，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天然气。但是世界石油产地政局恶化，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制造了战略真空。伊拉克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沙特阿拉伯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社会危机，伊朗饱受制裁、社会动荡，委内瑞拉经济也开始崩溃。目前维持世界石油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美国西德克萨斯的页岩油，页岩油的增产几乎构成了 2014 年以来全球石油增产的全部。但是据预测，美国页岩油产量有较大可能在 2022 年（即中共二十大的同一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在四年内彻底改变，当油价再度超过每桶 150 乃至 200 美元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变为逆差，同时高能源成本会和工人运动一样压迫利润率，加剧经济社会危机。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一系列次要的危机。例如小资产阶级数量增长和工资上涨受阻，即所谓“阶级固化”问题；在为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繁荣”所需要的维持房地产利润和维持房地产行业规模与众多小资所梦想的改善收入房价比之间的“不可能三角”（笔者会另文探讨），即住房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下金融和高融资成本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问题虽不及阶级斗争和能源危机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后者的爆发会加速前者发展的速度，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势必是一浪接着一浪，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会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本文的第三部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唯心史观与“中华帝国主义论”

在讨论“中华帝国主义”的具体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它的基本论点。系统论述“中华帝国主义”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红色中国网上转载的“话实”同志的文章《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另一篇是时代先锋网发布的“寒流急”同志的文章《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两篇文章关于“中华帝国主义”基本特点的论述大体一致，即：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由于压低工资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的方式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才能消除生产过剩。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想危机发生在自己头上，因此帝国主义的矛盾只能通过帝国争霸乃至战争才能缓解。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其国有企业集团（即两文所指的官僚资本）是进行争霸的急先锋，中国国有企业与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是核大战。按照“寒流急”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的“再崛起”，依托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组织性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结成工会等合法民主权利。“寒流急”同志强调，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改良派资产阶级和国企集团对工人的腐蚀作用，尤其要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感谢“话实”和“寒流急”同志的辛勤劳动，没有他们的两篇文章，我们将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倾向各异的表述中找出“中华帝国主义”的系统论述。

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中已经对“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争霸战争理论、生态环境危机理论做了批判，在这里就不必赘述。本文主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的观点。

（一）阶级斗争理论三个断层

“寒流急”同志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的恶劣待遇，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工资被扣，跳槽困难”。当意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时，工人就会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简单地讲，“寒流急”同志寄予希望的抗争是被逼到死路上的绝地反击，是历朝历代发生过无数遍的“官逼民反”，是防御性和碎片化的放一枪，“恶心一下臭老板”就走的抗争。

“寒流急”同志的斗争理论与“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相适应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话实”同志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尽管“话实”同志三番五次重申自己的危机理论不是“消费不足”，但是其斗争理论的前提条件却精确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消费品比例过低，不足以实现家庭团聚、体面生活等目标，一句话，难以维持自身和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历史背景是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产业后备军数量巨大和生产率进步飞速等。只要这些客观条件不变，那么资本家总能找到替代参与斗争工人的手段，要么是物美价廉的机器，要么是同样“物美价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就不会得到显著改观，工人的工资待遇就不会显著提升。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

“寒流急”同志自己对这些状况也有所认识，他指出这种“不干了”、“闹一闹”的斗争“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不利于“长久的罢工”等。但他把原因归结到工人阶级的觉悟不足上。实际上，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工人阶级由于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并不具备“长久工人组织”和“长久罢工”的经济自持力，这才是这些零打碎敲的阶级斗争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蜂拥入城、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国际产业转移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要求工人阶级具备远超过经济自持力的“阶级意识”，展开“长久斗争”，就相当于要求连井冈山都保不住的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般，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

所以，在如何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上，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寒流急”同志就只能给出从“小事做起”，“照顾细节”，“一人有难，大家帮忙”的“策略”。由于无视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状况，这种互助“策略”能带来的组织力量甚至还不如“法

轮功”。由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危机特点的错误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因而无法在“闹一闹”的阶级意识和长久扎根的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一个断层。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不是“消费不足”。据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介绍，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10年的约36%下降到2016年的约28%，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23%下降到15%，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48.5%上升到53.6%。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首先，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资产阶级在工资待遇谈判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都在上升；第二，由于工人阶级获得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积累了大量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第三，沿海工资上升的趋势迫使大量资本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内陆，把工厂建到了工人家门口，而本省本地的工人在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自持力等方面要远强于流动到外省的工人，这为“长久”的“组织”和“罢工”提供了广阔的根据地和后方，从而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力量；第四，正如笔者在第二部分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时所说明的，由于内地地方政府掌握的经济剩余明显少于沿海，因此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程度更深，力量更加薄弱，反应更迟缓，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严重，对派系纷争更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因而内地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的。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工人阶级强了，资产阶级弱了，又使工人阶级可以在自己的桑梓故地，迎战不是那么强大的统治机关，中国工人运动在此刻才取得了在某些具体环境下的“强弱易势”，才能“一闹再闹”，才能承受局部的失败和走向胜利。

“寒流急”同志认为，“独立于资本”的工会是工人斗争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也是解决工人斗争持久力不足、提高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固定组织。独立工会建设的初期目标之一是

通过“非法”斗争取得合法地位，并取得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寒流急”同志对合法工会的向往来源于工会在历史上的核心国家阶级斗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确，核心诸国的工会在劳资集体谈判、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作为阶级妥协工具存在的，其合法存在并发挥支持劳工作用的条件是劳资双方力量大体对等、生产力发展迅速、外围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提供了足够阶级妥协空间，这大体上对应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五十至七十年代大政府资本主义时期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资本家时，工会就是事实上的政权机关，对工人几乎没有吸引力，这大体对应着美国八十年代以后和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工人时，则工会就是事实上的革命组织。处在半外围的中国，由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需要贡献给核心国家，统治阶级不会允许独立于自身的劳资集体谈判机构出现，因而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由于对半外围国家阶级妥协空间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缺乏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将包括合法工会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利与未来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具体阶段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二个断层。

事实上，只有那些缺乏现实斗争经验、乖宝宝当习惯了的左翼知识分子才会对合法不合法、工会不工会的形式问题过分深究。在半外围的中国，在官僚机构普遍“非正式化”的条件下，面对“说你违法就违法”的腐败官僚，一般革命群众早已不认为资产阶级政权授予的“合法地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2018年6月漯河老兵的斗争中，老兵们在没有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备注册的情况下聚集抗议，显然非法；警方围困老兵并切断信号，拒不释放被殴打扣押的军嫂，也属非法。最终中央迫于压力派员处理此事，答应了老兵们包括惩办责任人、释进军嫂等条件，老兵们在达到斗争目的之后也有组织地撤退。深处斗争前

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关于政权问题，“寒流急”同志特别指出，未来阶级斗争不应当指望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但是他立刻就转到批判一些同志“抬举薄熙来那样的某些精英”的问题上，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正面回答，假设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甚至是合法工会的无产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能不通过“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来取得政权的问题。这暴露了“寒流急”同志理论的第三个断层：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缺乏认识，无法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可能的发展中得出革命胜利的可能道路，即无法回答资产阶级如何由盛而衰，最后丢失政权，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政权的问题。在讲完无产阶级意识大发展和工会合法化后，“寒流急”同志遇到了一堵高墙。

在高墙的这边，站着“寒流急”同志和他的合法工会，在高墙的那边，资产阶级政权依然耸立着。“寒流急”同志想必已经发现，他所设计的中国工人的“崛起之路”最多只能把我们导向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水平，而对如何打穿这堵墙、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却束手无策。在提不出任何砸墙战略的时候，“寒流急”同志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一面批判薄熙来和“左转派”，一面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最后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收尾。

然而，在“寒流急”同志的论述中，我们除了看到他强调工人应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革命者要“注意团结，光明正大”，知识分子要有“工人立场，结合群众”这些主观能动性之外，看不到任何“不可遏制”的历史必然性。仿佛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革命就能胜利一样。“寒流急”同志特别推崇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和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却忽略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是为了在白色政权的缝隙中寻找红色政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也忽略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为了寻找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两位革命领袖的理论是相通的，即在整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局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强弱转换；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现实斗争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分析、可操作的革命战略。相反，没

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任何关于“历史大潮流”的论断都注定沦为失败主义的温床，沦为在漆黑长夜里的胡乱放枪壮胆。

“中华帝国主义论”做不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做到。从全局看，只要产业后备军逐渐萎缩的趋势不变，中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和斗争力就会不断增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趋势就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发生重大逆转，世界石油产量无法满足需要，飙升的油价就会以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为代价使得大量剩余价值流入石油生产国；只要中国产出资本比不迅速上升，即生产率没有重大跃升，同时中国还在以不平等交换每年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价值，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总趋势就不会改变。利润率下降一方面意味着投资动机消失，从而进一步引发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减少，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再生产的重要事业单位，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乃至军警宪特都有可能发不出工资，因而加速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进程，从而显著弱化武力镇压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如各地教师、老兵、保安、城管和护士的罢工维权运动）。

从局部看，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内地，由于没有收买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镇压都会以更加直接、暴力且非法的面目出现。当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到一定程度，现有军警力量会不堪使用，而军警的“付费”镇压服务也加大了镇压成本，从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事态扩大。最终会出现统治阶级放弃一部分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系关系不大的地方资本集团（可能以黑社会形式存在），任其被群众力量淹没，乃至默认一些基层政权事实上自治状态的局面。同时，与当权集团矛盾较深的、独立性较大的部分地方集团也事实上处在半自治状态。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形式上的宗主地位，在地方和基层则出现反动的、改良的和进步的政权实质上独立和犬牙交错的状态。只要资产阶级无法改变全局上的不利因素，无法阻止利润率下降和崩溃，反动的和改良的政权就无法控制积累危机，导致工农群众乃至一部分资本家投向进步政权这一边。进步政权一方面应当采取积极的经济措施，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分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局部武装冲突以及和各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纵连横中训练干部队伍。当发生全国性的强弱易势时，进步政权既有群

众基础，又有斗争经验，同时掌握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有人有钱有枪。到那个时候，取得全国政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现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赖“若干地区的局部胜利”，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造反。”这不仅是对上一次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为下一次中国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二）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

“寒流急”同志和“话实”同志对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颇为反感。从杜绝右倾机会主义、实现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来看，我们当然要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单纯改良思想。但是，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在“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以薄熙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是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一样，他们的论断同样是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相适应的。由于工资被压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用改良措施分给工人一部分消费品，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工人反抗和生产过剩两个危机。为了堵住资产阶级一箭双雕的方案，“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改良派和国有企业的攻击一直居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如果这真是个好方案，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早点使用呢？“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利润挤压”的角度来看，一切就明朗了。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压低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率，因而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有效需求缓和阶级矛盾，但根本上讲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壮大而不是减损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薄熙来集团被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其他集团消灭了。这并非“寒流急”等同志的功劳，而是利润率的要求。而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熙来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小资产阶级数量的膨胀和收入的上升。要维持民族主义作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继续扩大小资队伍、提高小资

收入就是必要的条件。在利润挤压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给出的“中国梦”可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就业、要加薪、要住房的诉求，人民日报都不得不给“中国梦”降温，指责年轻人要求太多，缺乏“历史耐心”。民族主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诉求，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满足的。一部分小资群众民族主义的梦幻会在面对就业市场或看到房价上一眼望不到边的“0”时灰飞烟灭。而包括“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在内的青年左翼，面对的多是尚未尝到剥削滋味的大学生，等他们毕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迅速明白：这“厉害了”的玩意，可从来不是“我”的国。

（三）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如果“寒流急”同志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寒流急”同志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他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的（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

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一方面，“寒流急”同志在文章里反复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弱的可以变强，小的可以变大，原来弱小的可以打败原来强大的。

这种转化的条件来自于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半外围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组织力不断增强、觉悟不断提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和谋求内部的妥协；后者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从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无法阻止自己的统治机关日益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因为它无力也无心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条件下的种种困境。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弱小的就可以变为强大，原来貌似强大的其腐朽虚弱的

本质将暴露无遗，各中间阶级的立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条件变化的过程超越一定的点以后，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历史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与唯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不是“创造可能”，而是“实现必然”。中国革命的到来不是一片漆黑乌云压境之时的祥瑞天降，而是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中的百川入海。

参考资料：

时代先锋网：《联想已成过街老鼠，华为就是“民族自豪”？》，《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石油峰值桶”网：<http://peakoilbarrel.com/>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人民日报：《年轻人需多些历史耐心，别丧失拼搏勇气》

红色中国网：《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红色经济参考》系列文章

简单说说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远航一号（2016年4月，红色中国网）

在革命高潮来临之前的政治上相对平静时期，在左派进步力量中往往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是靠严肃的科学分析，而是凭主观想象、凭小资产阶级热情，幻想危机和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并且将危机到革命之间的发展过程想象成是短暂的、迅速的、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严肃、科学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脚踏实地了解并且信任工人阶级伟大革命潜力的基础之上，并且它对未来革命进程不可避免要面临的严重困难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其对危机与革命的信心不可能是真实的，而是随时会发生动摇的。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左翼青年在某一个时期积极地宣传危机速来、革命速胜，而一旦危机暂时没有来，很快就发生动摇，对前途丧失信心，将资产阶级想象得强大的不得了。自己低迷，然后又去感染别人。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错误倾向。在今天中国的左派队伍中，恐怕也是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认为，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十分强大，工人阶级除了被动挨打，几乎不能做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有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可以不断地给资产阶级增加困难并最终造成其灭亡。至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则认为它已经更加强大，更加巩固。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种争夺必然导致战争。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口头上说一些“战争引起革命”一类的话，这种倾向中的多数人是认为战争将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克服危机。似乎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一打仗，就成了资本主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些同志，或许是在虚拟世界中生活久了，以为战争不过是另外一种游戏而已，资产阶级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习大大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根本不懂得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人心等方面的条件，更不去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了解资本主义，不了解现代世界和中国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自然就不可能了解战争。

那么，现代战争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前频频爆发的各主要大国之间倾全国所有、全民皆兵，以彻底消灭敌对国武装力量和战争资源为目的而展开的决战。这既是由于战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毁灭性，也是由于世界人民的普遍觉醒（从而使得各主要国家都已经不再可能动员绝大多数成年男性投入到全民皆兵式的战争之中）。

除去各种局部战争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正影响国际政治全局的、最主要的战争形式，是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针对中小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侵略战争，有的是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霸权的目的，有的也是为了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

朝鲜战争，是一次大国之间直接交锋的常规战争，以基本恢复战前态势而结束。越南战争，中、苏两个大国都没有直接参战。美帝国主义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后，以失败而告终。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失败以后，美国霸权就已经开始衰落。在美国国内方面，其内部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再允许其进行大规模征兵。这就迫使美国后来只能以较为少量的陆军辅以大批所谓“高科技”武器进行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失败，导致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稳定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全面崩溃，美国霸权陷入全面、快速的衰落。

所以，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连美国这样，在军事上占有绝对压倒优势的霸权国家都已经不能通过侵略贫弱中小国家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那么，像中国这样，实际有效战争潜力不仅远逊于美国、甚至不如俄罗斯，充其量是一个军事二流大国，相对日本都不具备海空优势，即使是侵略一般中小国家，都不见得取得如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初期所能取得的那种战术胜利，更遑论与美国通过战争的形式争霸？

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强大”，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与美国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有不少青年同志，由于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革命运动以及各种进步理论的发展，在理论学习方面，过于依赖少数几部经典著作，而又不能够在有大量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经典理论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应用于现实斗争中，于是往往就想当然地、机械地将现在中国和世界资本

主义的某些表面现象生硬地与经典社会中的一些结论拉扯在一起。具体来说，就是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发生战争，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也必然会进行战争的准备和实践。

众所周知，列宁所创作的《帝国主义论》是为了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并为当时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引方向。列宁的不朽篇章，永远是后来的革命运动从中获得启发和指南的思想宝库。但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做出的各条具体结论，则只能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再没有发生新的战争。不仅没有发生新的战争，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西欧、日本资产阶级之间，其相互的、共同的利益是主要的，而矛盾和冲突是次要的。

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现在既不是半殖民地或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承担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工业国。作为这样一个半外围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向美国、西欧、日本输出大批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方式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转移大量剩余价值。如果没有通过剥削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而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能不能运转，是很成问题的。然而，中国资本主义要承担这样的“世界工厂”的职能，就必然要到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去采购原材料，就必然要从俄罗斯、中东进口能源，就必然要依赖日本、德国提供的机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资本输出”乃至所谓“一带一路”，美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乐观其成。因为只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断壮大乃至“强大”，美国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中国的超额剩余价值，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才能运转下去。

在中国资产阶级方面，除了他们个人之间已经与美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就其阶级本性来说，它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维持住世界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中国资本主义除了需要美国的市场以外，还必须服从美帝国主义制定的金融规则，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美国海空军来保护中国经过印度洋、太平洋的贸易航路乃至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来源国的政治稳定。所以，中国资

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现有的资本积累的格局下，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也决不会真正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而是会在涉及世界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做“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制裁朝鲜仅是一例）。

当然，像任何两个资产阶级一样，中、美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也可能想在周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又为美帝所承认的势力范围。但是，相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根本利益，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这些都属于枝节问题。中、美资产阶级或者中、日资产阶级或者陆、台资产阶级是决不会为了这些枝节问题而闹翻天、撕破脸乃至大打出手的（这与他们对朝鲜的共同的切齿痛恨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一个以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有它的特殊矛盾。一方面，中国有着一个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有战斗力的新兴工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给资产阶级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又不能像核心国家那样用剥削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赎买一部分工人贵族乃至形成一个时期的阶级妥协的局面。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将无法解决它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并且终将被这种矛盾所埋葬。

有一些同志，学了一些半生不熟、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于是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庸俗化。比如，庸俗地、不加分析地谈什么“一切资本主义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据此又推理出只要消灭“过剩资本”就可以克服危机，而战争据说可以消灭“过剩资本”，所以资本家就要打仗，打仗就可以解决危机，云云。

这样一大套胡言乱语，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任何的实际印证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充其量也仅是在少数的、局部的意义上符合实际。

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的阶段都表现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因此都表现为生产过剩。但是，这仅仅是危机的表象，而不是危机的形成机制。认识到这点，充其量就像认识到“人感冒了就会头疼脑热”一样高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还没有实行系统的、自觉的宏观干预政策，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由于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不足而导致的有效需求

不足的危机。当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了对外扩张的目的而实行军备竞赛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由此而导致财政上的赤字开支，是有可能起到暂时缓解危机作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自觉地加强了国家干预，单纯由于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而导致萧条的危险已经大大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再需要采用“战争”那种不自觉的国家干预方式来缓解经济危机了。当然，帝国主义国家乃至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会进行战争，但是这要由资本主义其它方面的矛盾来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普遍大大增强了。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工人阶级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是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增强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正是为了对付这样的危机，才产生了新自由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对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方法来改变阶级力量对比、重新建立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暂时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一旦起来，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要垮台，世界资本主义也将摇摇欲坠。

资本积累，必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积累。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哪个历史时代，大规模消灭有形物质资本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克服全局性、长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将战争乃至战争带来的毁灭鼓吹成是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法，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家的疯言疯语！

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话实（2017年9月，激流网）

摘要

从世界 500 强的资料入手，本文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的分布和特征，从中汇总了中国资本崛起的一些证据，接着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在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以外，通过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的垄断，通过不等价交换，来掠夺世界的财富，而后论证了生产过剩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之外的帝国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帝国的矛盾等。

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本文较系统地批判了超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学说，指出资本的“DNA”就是竞争、垄断、霸权，因而不可能有一个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主体来维护所谓的“世界体系”，且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为“中心、外围”的本事取决于其整合资本的能力。舍此则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随着实力的变迁，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

本文从垄断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资本的崛起，尤其是国有资本集团的一些基本属性和特征，且列举数据表明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

基于资本集团要么扩张，要么消亡的基本逻辑，国有资本集团今后的发展必然要与现有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并依此分析中美之间矛盾的特点和趋势。

目录

前言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三)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五)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四)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一)天朝的国际地位

(二)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三)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四)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五)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六)历史的教训

六、结束语

前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繁荣”泡沫的破裂和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这一泡沫的破裂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他们克服这一危机的办法除了进一步“放水”的“货币量化”政策以外，也就是除了进一步地把资本泡沫吹大和转嫁危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灵丹妙药。

九年来，在几乎零利率和政府赤字翻番的强心针下（比如美国的赤字从 GDP 的 60% 剧增到一倍以上），苟延残喘的发达国家经济一直获不得令人信服的复苏。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来对付下一次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的世界格局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的实质，各方的判断和分歧显著。

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在中印边界有争议的地区修路，在中东的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地通过债务豁免建立 99 年租赁权等等的举动，哪些是捍卫和恢复主权的正当行为？哪些是为争霸铺垫的帝国主义伎俩？

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是为进一步私有化，变中国为西方跨国公司肆意践踏、入侵和占领的国土，还是为了加强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使得其掌控更大的资本，以便其更好的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近来不时爆发的工人闹事、罢工等运动的高涨是境外敌对势力操纵的结果，还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中国梦”是加速被殖民地化，还是快步走向帝国主义的“理想”？

除了一些整天危言耸听地叫喊中国正在被殖民地化的民族主义“左派”以外，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国内外基本上不争的共识。就连一贯紧跟着美帝的菲律宾政府也看到了世界格局的改变，认识到利用中美对峙为其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时刻已经到来。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那些高喊中国被殖民地化的人士对此也不得不改变一下自己的声调。

那么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走向帝国主义的大国？

强国派对此毫不掩饰的感到兴奋，说“看到祖国这样流氓我就放心了”，西化派替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必将遭到的挑战感到担忧。自称“左派”的内部对此问题争议颇大。那么搞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问题牵扯到现中国社会的性质，牵扯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在中国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应持的立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要正确的认识当前的局势，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帝国主义？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否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即资本的全球化是否推翻了列宁的理论？

如果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正确的话，那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帝国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期的回光返照？

崛起中的国有资本集团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霸力量还是争霸的中坚？

苏美争霸时期的军备竞赛、代理战争、势力范围摩擦等对今后中美对峙有何启示？

要回答这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把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事实梳理清楚，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分析这些基本事实的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大数据时代，每日每刻都有海量的信息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如果我们不想被信息所淹没，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信息。

为此，我们将首先梳理一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基本事实，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几个基本矛盾，然后就如何分析这些事实和矛盾所需要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些探讨，以便为最后分析崛起的中国与当今帝国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我们不妨从全球垄断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世界 500 强入手来分析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

MAPPING THE GLOBAL 500

Each circle on the map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a company headquarters; and the circle's size represents company revenue. Zoom in by double-clicking on the map to explore company locations and hover over the circ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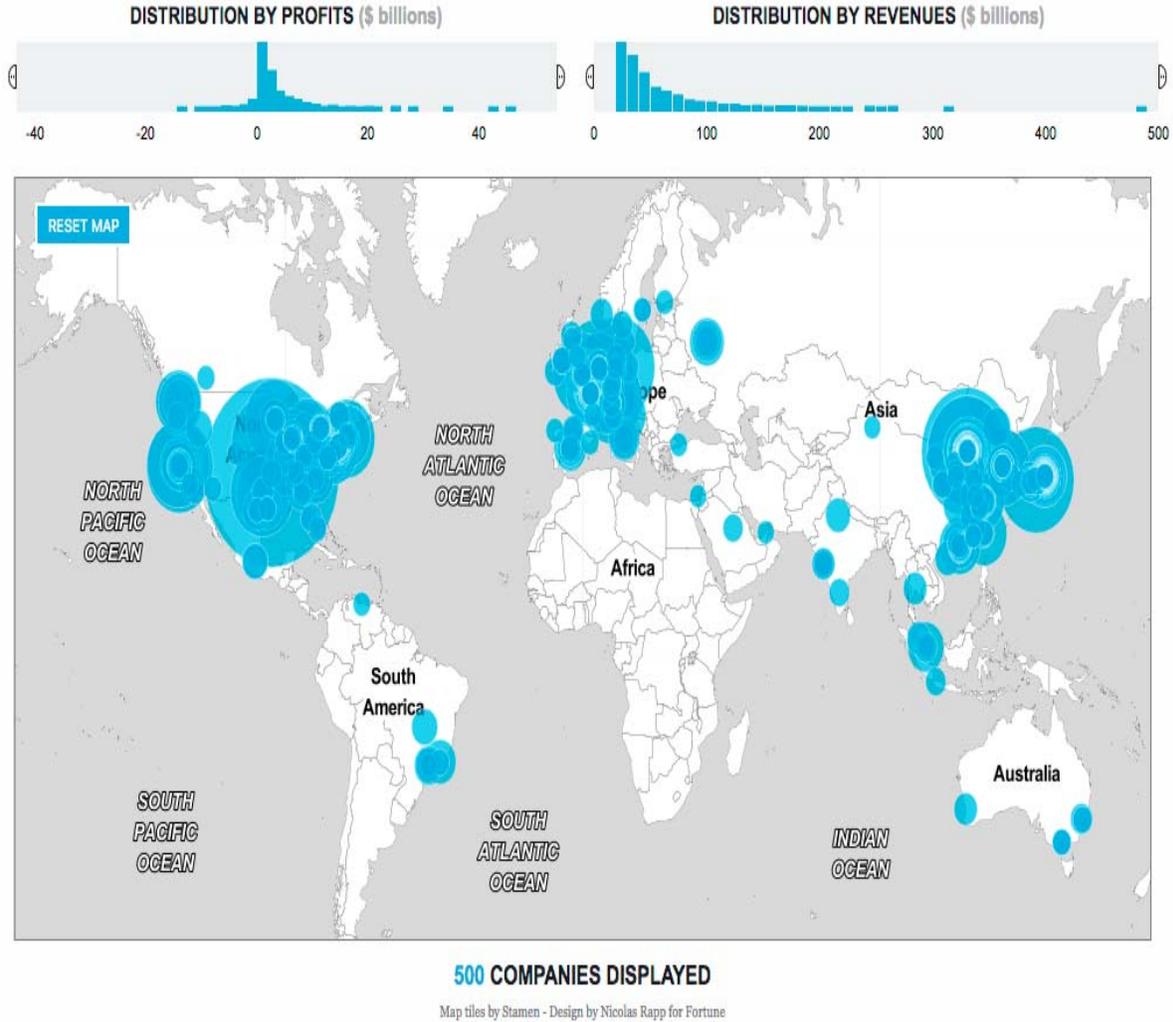


图 一、世界 500 强的分布，
http://beta.fortune.com/global500/visualizations/?iid=recirc_g500landing-zone1

从世界 500 强的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资本实力主要是集中在 3 个中心。首先是美国，其次是德、英、法等老牌西欧帝国，再有就是亚洲的中、日两国。

国家/ 地区	上 榜 %		利 润 %		营 业 额 %		资 产 %
	14年	17年	14年	17年	14年	17年	17年
美国	26%	26%	28%	42%	41%	31%	30%
西欧	28%	27%	30%	18%	21%	27%	27%
中国	20%	23%	20%	22%	16%	23%	23%
日本	11%	10%	10%	9%	7%	10%	10%
其他	15%	13%	13%	9%	15%	10%	10%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从表一上看，各国 2017 年世界 500 强中，美国的资产大约占 30%，德、英、法等的西欧占 27%，中国（包括占比很小的港台）占 23%，日本的才占 10%。其余的合计也只有 10%。当然这个资产占比并不反应一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的资产绝大部分在国内，而其他老牌帝国的资产多在国外。

国家地区	金融					工业					服务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美国	25	22%	30%	24%	23%	55	20%	54%	23%	23%	51	47%	60%	56%	46%
西欧	37	33%	15%	34%	34%	68	25%	10%	27%	26%	32	29%	29%	22%	28%
中国	23	20%	37%	23%	22%	75	28%	18%	27%	30%	11	10%	7%	9%	12%
日本	11	10%	6%	9%	12%	32	12%	11%	11%	10%	7	6%	1%	6%	10%
其他	17	15%	12%	10%	9%	39	14%	6%	12%	11%	8	7%	3%	6%	4%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按金融、工业和服务的区分，即表二来看，中国的工业，除了利润（被金融拿走了）以外，（已多年）在其他各个指标上都是领先的。

除了世界 500 强的数据以外，中国的崛起在其他指标上来看，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钢铁产量、发电量、汽车产量、高铁里程、专利申请、高等教育人数等等指标都是世界第一

（当然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指标还远远落后）。军事上，中国是美、俄之外，超过英法德的世界第三军火出口国。相比之下，印度是靠购买军火来实施地区扩张主义的国家。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世界垄断资本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大的财富积累。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前者推行霸权、掠夺和剥削后者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个前者压迫、统治和剥削后者的关系一样。但是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是通过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单位劳动时间（比如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和单位时间（比如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差，即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1]

相比之下，帝国主义体系内国家之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就大不相同，就主要的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如果是等价的就不存在帝国主义。

那么废除了旧的殖民主义制度以后的全球化的帝国体系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统治、掠夺和剥削的关系呢？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大类：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和资源垄断。所有这些都是不等价交换。

1.货币霸权：利润率最高的应该算是美元霸权（它可以直接以印钞票的方式把资源从其他国家掠夺过来），它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它的利润额是有限的，美国不能无限制的依靠印钞票来维生。

2.金融霸权：以华尔街金融寡头、和世行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金融霸权所获得的利润率比不上美元霸权，但它相似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逼着很多亚非拉国家一方面不得不用大量的出口去还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新的贷款去还旧债，因而它的利润额非常大。这里谈不上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有掠夺。

3.资源垄断：跨国公司通过对石油（或通过对石油产出国，如沙特阿拉伯的掌控）、矿石等资源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但是依靠这种旧殖民主义的资源垄断方法获利，其规模还是有限的。

4.科技垄断：这里财富的掠夺也是通过剩余价值以外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劳动价值论承认一个商品只有一个价值，而不是劳动效率低的产品价值高。但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尤其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复杂多了。发达国家用高科技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去换回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里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也就是发达国家用包含较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获取其他国家包含着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转移的主要形式[2]。比如中国过去要用几亿条裤子换回一架空客380飞机。同样的，美国的农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一个普通的美国农场主一年生产的农产品，比如上千吨的玉米，出口到墨西哥，一举就会使得几十个、上百个当地农民破产，迫使他们到出口加工区打工，生产出的纺织、电子等产品廉价地卖到美国去。结果就有美国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可以换回墨西哥几十个、上百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相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基本上都是等价交换，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技术和专长，所交换的产品中的单位劳动时间相差不大。

由于最后的这个不等价交换的渠道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有着流毒甚广的错误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不等价交换大大的降低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成本，维持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利润率，有效的抵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论证的有机构成增加所本应发生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3]。以此对比如下的断言：“1945年后的‘新政’实质上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合作为条件，分享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4]。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因为，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无论有多大的差距，也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该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要的花费，也就是生儿育女、抚养老人和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等的花费。

如果没有科技垄断，那么欠发达国家就会很快的掌握任何新的科技（模仿比创新要快的多，因而后起者的跳跃式发展优势很强，像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样[5]），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趋向于等价交换。这就是帝国为何要极力防备欠发达国家掌握新科技的一个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这几个渠道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科技领先，资源是老式帝国的特征。有了这两者才会有金融，有了金融才会有货币霸权。

一旦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可以作为储备货币，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印钞票来获得那些把他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国家的财富。其他除了欧元区和日本以外的帝国，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享受不了这种仅仅依靠印钞票就可以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货币霸权，但是金融、资源和科技他们多多少少都享受一些。

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在这些渠道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区别在哪里呢？

1.虽然 IMF 批准了人民币的储备金地位，但是除了少数东南亚地区通用人民币以外，中国至今还未能由此获得多少货币霸权的红利，但是他正在努力实现自己货币的国际化，为将来实现类似欧元、日元那样的货币霸权打基础。韩国、印度和巴西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希望。

2.金融霸权他目前还谈不上，至少规模不大，亚非拉国家上钩的还不多，其真实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亚投行的建立已经为这方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开端。有关韩国、印度和巴西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搜集，除了他们比不上中国，其他的不好说。

3.资源垄断方面他好像目前主要的是受害者。他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他正在全世界范围努力购买和掌控各种资源。韩国没有多少资源，印度和巴西的被跨国公司掌控的应该也不少，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搜集的不够，还不好下结论。

4.科技垄断正在被他打破。虽然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不能和发达国家进行等价交换，因为自己对市场和科技的掌控还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快速的改变。中国对外的装备输出已经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比如类似高铁一类的装备和军火的出口。他和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等价交换，进而他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不等价交换。韩国在这方面能够享受部分不等价交换的暴利，好像印度和巴西还不行。详情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由此可见，相对韩国、印度和巴西，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架势的国度，起码他正处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为了认识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懂得他的内在矛盾和由此带来的运转规律。下面论述的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劳资矛盾，其次是帝国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由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光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动力，而且也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矛盾。各国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可以更深刻的从生产过剩危机中揭示出。

(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尖锐的矛盾，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政权都把国家的暴力手段（警察和军队）放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上，放在应对本国人民对私有制的反抗上。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帝国一方面必须通过转嫁危机才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打压帝国外的工人阶级才能捍卫对外投资的利润，并依靠廉价的进口来进一步地打压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由于劳资之间的矛盾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论述。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首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与俄罗斯的矛盾。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当今越演越烈的叙利亚危机。从俄罗斯派遣他仅有的航母来捍卫自己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来看，后者目前还有加剧的势头。反恐是双方的借口，难民是美俄争霸的后果。其次是美国与欧盟的矛盾。欧元区的创办，空客公司的组建，都是欧盟与美帝矛盾的表现。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把欧盟内部的矛盾暴露无疑。同时，美国利用欧盟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主权危机，削弱了欧盟对美国的挑战。英国脱欧虽然也是欧盟危机的一个表现，但是没有英国以后的欧盟有可能对美国的挑战更强。这或是美国反对英国脱欧的原因。

再有就是美国与日本的矛盾。后者至今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军事上他完全受控于美国。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迫使日本接受 IMF 的方案，其在东南亚的投资损失惨重。

美国与中国这个崛起之国的矛盾本文稍后再展开。

(三)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除了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以外，所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当前依然存在，即所谓的“南-北”矛盾。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矛盾。

实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一个新兴帝国的出现或崛起确实可以起到打破已有帝国垄断体系的作用，给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余地，就像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一样。菲律宾最近试图利用中国的崛起来解脱美帝对他的控制就是一例。

相比之下，苏联的解体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是个损失，造就了近 25 多年美国为所欲为的、一国独霸的、新自由主义猖獗的世界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兴帝国的性质，能够有效地利用帝国之间的矛盾（就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那样有效地利用了美日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像王明那样盲目的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中国的崛起就有助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现有帝国体系的控制。

但其前提必须是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否则是很危险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利用帝国之间矛盾的立场，而是依靠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最终不会获得自身的解放。回顾当初美国百年前的崛起打破了“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垄断时，他也暂时地“赢得了人心”。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些左派错误的认为：“在国家干预的条件下，传统的以生产过剩为形式的经济危机不再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威胁，其破坏程度显著减轻了。” [6] 在他们看来，反而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 [7]

历史的事实却一再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的过剩，而不是其他的如资源危机或生态危机等等。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但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工人阶级的总消费的时候，也就是有了剩余的时候，这些剩余才有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整体的利润（这里可以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等等的需要，因为这些都看做为产出的折扣）。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加到一起要多于所有工人所购买的产品才有留给老板们的剩余。工人的产出和工人的消费之差越大，剩余越大，整体利润才有可能更大。把剩余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经济便增长。

虽然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因此每个资本集团的剩余产品只有在被其他资本集团购买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那些剩余的产品才能转换成利润。这是剩余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即资本增值的必要条件。否则那些剩余产品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但这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往后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严重。一旦多个资本集团对将来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失去信心，也就是对产能泡沫式的不断扩张失去信心，经济危机就必不可免。这就是宏观视角的生产过剩危机起源。

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人民的消费不足引起的。这是不对的。自古以来，人类的多数都是消费不足，只有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是由于消费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而且往往首先过剩的是投资用的工业品而不是消费品。所以，所谓的消费不足看起来和生产过剩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其实不然。生产过剩是绝对的（因为过剩的不是消费品），消费不足是相对的。生产过剩是原因，消费不足是结果。这一点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投资前景的冷却带来投资的下滑、工业品的积压、利润的下降、生产的过剩，才有工人的失业、消费的下降。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产出和消费的同步增长，它就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像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到其解体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是资本主义一般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说明单个集团的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除非特殊需要(如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一般不会自动地协调相互的生产,而且单个资本集团的生产扩张一般不会直接地造成其产品的过剩。相反地,采用新科技、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资本集团往往会使得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都下降,因而会使得扩张相对不足的资本集团的产品竞争不过,成为过剩的产品,从而挤垮后者。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从微观视角来看,单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是资本集团竞争的手段。

但是单个资本集团在行业内部的“理性”微观行为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非理性”宏观行为。为了生存,每个单个资本集团都拼命地扩张其生产规模[iii],因而造成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张。但是这一总体的扩张只有在高于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消费的增长时才会有属于资产阶级的总体剩余的增长。一旦总体剩余不能转换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生产过剩危机就会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要么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如发现新大陆或拉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体系),要么是通过新科技对原有固定资本的淘汰来缓解产能过剩(如电视有一段时间几乎淘汰了电影,手机几乎淘汰了座机,数码相机基本上淘汰了胶卷相机,或汽车和飞机在美国基本上淘汰了火车等等)。

否则,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摧毁过剩的产能!自然灾害可以直接破坏产能,进而缓解生产过剩。战争是破坏过剩产能的另一个渠道(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一片废墟)。当足够的产能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摧毁后,产出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为新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没有新市场,没有新技术,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那么产能的过剩就只有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解决。实力弱的资本集团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得不破产,这样就有可能淘汰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产能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

与封建帝国基于简单的贪婪而进行的扩张不同,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起因之一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生产过剩。基于小生产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能生存,但是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帝国主义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因而他必须通过对殖民地的倾销和掠夺开拓自己的市场,

获得新的资源，缓解国内生产的过剩（百年前日本在中国大力发展采矿业和倾销工业品就是一例），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后期的发展才由商品的输出转向资本的输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起先也是通过对其他国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操控来造就新的投资机会和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市场进一步地开拓，暂时地缓解了帝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中国加入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把后者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直到 80 年代中期也没有明显缓解的总危机趋势推迟到了 2008 年才又一次爆发）。其结果却是后患无穷的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如果近期没有重大的新科技来开拓新的市场或强行淘汰大量的旧有固定资本（假如一种新的化工材料可以完全替代钢材的话，或一种新的科技使得光伏产品的造价成为极其底廉，进而几乎可以完全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话，这些新科技就会大量地淘汰类似钢铁或能源等行业旧有的固定资本），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就只有通过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来摧残过剩的产能，以便恢复产能与市场的平衡。

但是各国资本都希望通过摧毁他国竞争对手资本的产能来缓解自己的产能过剩，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

(五)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虽然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马列毛主义者要一分为二的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它激起了全球人民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反抗，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帝国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但是它也有提供新投资机会，从而拯救资本主义的一面。相比以上所列举的各种资本主义下不能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有可能克服生态危机的。

比如，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往往是和自然灾害相关联的，但是另一方面 19 世纪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和欧洲同期的黑鼠瘟疫对于制度的冲击好像并不严重。这是因为资源的枯竭本身看像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并不直接地威胁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日本前几年的大地震并没有增强日本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资源的枯竭当然会威胁个别依靠垄断资源的那些资本集团的生存，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反而因祸得福。天然橡胶的局限推动了人造橡胶的发展，石油资源的枯竭推动了日光的利用，

等等。因而资源的枯竭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有可能推动科技的创新，造就新的投资机会。2008年兴起的液压分裂技术就大大增加了美国的页岩油和天然气的产量。中国的风电、光伏等行业前期疯狂的扩张和目前的生产严重过剩危机恰恰是因为生态危机还没有“及时”到来。正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石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人类找不到石头，石油时代的终结也会远远先于石油资源的枯竭。[9]

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的强调，资本主义恐惧的不是资源的稀缺，而是生产的过剩。除非帝国之间的争夺摧毁资本主义，生态的危机有可能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当前中国政府正是在利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契机强行迫使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关闭，以便缓解很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一例。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面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摆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有效地抗争帝国主义。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帝国主义形态有所转变。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以前各个帝国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旧殖民主义。基于这种新的情况，今天的列宁也不会套用他百年前的定义来分析当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体系。

因为只有懂得了一个事物的根本规律才有可能正确的预见这一事物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对资本主义出世以后的帝国主义以下的几种不同形态必须有所研究：

早期的帝国主义是从自由竞争到行业垄断，然后导致金融垄断的出现。列宁在百年前研究了这种形态的帝国主义。

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是垄断的升级，即从国内和殖民地垄断到全球化的以核威慑为靠山的美国垄断资本超级大国垄断地位的确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高度整合，以便一方面通过如美国的“新政”或欧洲的“福利国家”来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通过如 IMF、世行等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垄断集团之间的交往。这是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生产的全球化和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掌控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新特征。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是通过直接掌握国家机器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登峰造极的国家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新特征，至少有两个理论框架左派和进步人士可以用来分析当代帝国主义。这两种方法将产生全然相反的方针、路线和策略。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滋生帝国主义的动力。既然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法则或逻辑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这种资本的无限积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竞争开始如何的“自由”。争夺霸权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质性的“DNA”。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组合资本的能力。

百年历史证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列宁抓住了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规律。因此，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分析问题的单位就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即单个资本集团，如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等，即垄断资本的功能单位，以及为这些资本集团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无视垄断资本的力量便无法认识帝国主义！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它回避每个垄断资本集团在划分世界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过程中所能撬动的经济，政治和最终军事的力量。

比如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列强、帝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像 IMF、世行、WTO 之类的全球性组织来调和，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10]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作为依据，认为世界列强必然要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大局”，帝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能发生。

请看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典范论述：

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庞大，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也占相当的比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门或者是为出口制造业服务，或者是依附于出口制造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既没有、将来也不会造成类似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目前主要表现在美国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因而美帝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不再能够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比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以及朝鲜的核威胁），当然更不能有效地应对愈演愈烈的世界环境危机。**但是，美帝的这种衰落并没有严重加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没有严重加深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黑体是笔者所加）[11]

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除了国内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国外争夺霸权以外，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表面上看，联合国、世行、IMF等国际组织是全球资产阶级“民主”治理国际事物的平台。实际上各方在这些国际组织上的话语权是按照各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分配的。

因而这位作者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看到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还看到了“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但是他看不到中国这一资本核心的进一步扩张就必然要与西方列强进一步的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其中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这些人把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主要的看成是那种类似富士康的，来料加工、大进大出的，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以高铁为代表的国企和类似三一重工等私有装备垄断企业，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压力下，为了生存，越来越注重出口，且不得不用“走出去”的战略来克服国内困境的那些制造业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

这一错误论点或许源自一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它特别强调（其实仅仅是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国际“分工”的作用，但是（除了同义反复的“中心、外围”分析以外）没有说明“分工”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工”现象的出现，以及“分工”变化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在此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国际“分工”比较固化，不易互换，并且既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资本主义专攻制造业生产”[12]，那么该理论家就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走向“核心”的证据。这是个全然颠倒了因果关系的理论。他没有看到垄断力量是“分工”背后的驱动力，因而不懂得垄断是本质，“分工”只是现象，且国际“分工”是由垄断资本之间依靠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竞争所决定的基本事实。

如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核心部门的出口制造业确实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那么“一带一路”就是多余的，亚投行就是不可思议的。因而这些人看不懂当局力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因，认不清中国发起亚投行的意义，看不到后起的垄断资本集团必然要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逻辑。挑战却已成现实。亚投行是当今美国不光没有否决权，连表决权都没有的或许唯一的国际金融组织。

后起的“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这种搭便车行为确实符合近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但是中国对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秩序越来越不可忍受。中国虽然是世界很多资源（如铁矿石、石油等）最大的进口国，他却没有什么定价权。中国买什么其价就涨。同时，他又是世界多种商品的出口国，他也没有什么定价权。他屡遭反倾销制裁，且卖什么其价就降。

因而说“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全然不符合事实。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正是看到了这些挑战，才有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推动美国主导的、中美两国共同“治理”世界的所谓“G2”体制。后者完全是中国一帮学者的一厢情愿，美国不可能认同什么“G2”体制。

由此可见，说：“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是个全然不顾事实，唯心主义的主观推断。

按照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说法：“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不走“持剑经商”的道路有何可能？

百多年前，考茨基认为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遏制帝国之间争霸的战争，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他的超帝国主义论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无情地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上。然而，正当帝国之间的争霸越演越烈之时，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幽灵又以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态起死回生。但是，连该体系论的主要理论家沃勒斯坦都不敢断定帝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些人误读了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自以为 70 多年没有世界大战证明了帝国之间有可能在国际机构下，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和平共处。他们明明看到“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却看不到美帝的衰落必然带来的帝国之间生死攸关的争霸斗争！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为了更彻底地澄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超帝国主义论的区别，我们有必要对世界体系论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和批判。

1.该论的简介

二战后，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诸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着大量的分析和著作。他们都或多或少遵循马列主义的传统，加上各自的“小创新”。但是魔鬼在细节上，面对当今的关键问题，正如考茨基与列宁在战争爆发前的“小差异”一样，他们的“小创新”就会产生与马列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世界体系论的著作非常庞大且繁琐，我们需要一个简要地表述。起码在红中网上他们是这样描述的：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多国经济体系。到了十六世纪，西北欧地区上升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原来较为领先的南欧地区下降为半外围，东欧则沦落为给核心地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外围地区。通过地理扩张，整个美洲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贵金属、自然资源和移民空间。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系。

在历史上，核心地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核心地区攫取并积累超额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维持本地区内部的阶级妥协（培养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外围地区是主要的向核心地区转移剩余价值的地区。在二

十世纪，半外围地区是核心地区以外主要的辅助性积累中心，承担着接纳从核心地区转移出来的较为过时的产业的职能。这种辅助性资本积累职能，造成了半外围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得半外围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阶级矛盾最集中、资本积累结构最脆弱的地区。[13]

这里阐述的明明是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史，但世界体系论者非要用什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概念来描述。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十八、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后期帝国主义时代的区别。

世界体系论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的过程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在西欧地区形成了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西欧各国的竞争导致对外扩张，并成功地形成了以西欧各国为中心（后来扩大到包括北美、大洋洲和日本），掠夺和剥削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世界体系。第三，对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是世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主要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形成和发展，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1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广大外围地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但是这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在这三个核心观点上恰恰都是错误的。

2.该论的几个谬误

首先，资本主义能够在全球扩张，最根本的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致，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历史偶然性”和“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人类学会用水力或蒸汽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资本主义便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必然结果。这是世界体系理论家试图反驳的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家倾向于混淆两个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此刻的对抗与封建王朝的对抗相似。第二个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封建王朝之间的争论是基于贪婪，而不是

基于生存。自给自足小生产者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可以很好地生存。基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造就垄断，垄断必然导致霸权的规律，垄断资本出现以后帝国之间的战争和无止境的扩张都是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生存。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才是垄断资本的运动规律。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框架因此无法区分一战以前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视所有战争都是“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结果，对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或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一视同仁。例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垄断出现之前和之后的帝国主义没有任何质的差异。[15]

其次，世界体系论者和卢森堡一样错误的以为没有“外围”国家所提供的市场和资源，发达的“中心”就无法进行资本的积累，因而不可能生存[16]。例如，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积累是通过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而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实现的[17]。这一错误的理论意义在于，没有任何殖民地或者从资本出口中提取超级利润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蜕变为帝国主义。

其实，“中心、外围”的对立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它的必要条件。第一、所谓“中心”国家的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心”国家。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网站最新的 2014 年资料，美国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中 90% 以上来自“中心”的 OECD 发达国家。[18] 当然这一数据有可能大大低估了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但是投资额的数据还是相对可靠的。第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外围”国家的贫穷，那里的资源其实比起那里的市场更为重要。即便如此，获取“外围”国家的资源也不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就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虽然有利于个别资本的积累，但两者都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他有利于暂时地缓解或推迟“中心”国家的经济危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推迟而不是克服“中心”国家经济危机的意义上，“外围”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劳、资两大阶级的对立，是剩余价值的获取。

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垄断的出现也是会有超额利润的。只是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掠夺中小资本占有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是通过更加深刻的剥夺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

值。比如美国早期铁路交通和石油垄断的产生，就是以牺牲其他中小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帝国主义仅仅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的超额垄断利润也是以牺牲“外围”资产阶级的利益获得的。

再有，生态的制约只是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如前所说，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不是资源稀缺，而是生产过剩。

3.“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

虽然世界体系论的出发点明显的不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辩护，但是其结果却必然如此。世界的生态和气候无疑是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但是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也是不断地强调其在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

不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用垄断的腐朽性、寄生性来解释为什么帝国会没落，因而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就解释了世界格局的变迁，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论只是描述了，但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会上升为“中心”国家，有些会没落为“半外围”或“外围”国家。[19]

一个世界体系论者反而断言：“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前沿竞争，也不可能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中东石油出口国）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竞争。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依托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转变为可以任由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据此来吸引跨国资本，进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 [20]

在该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不光是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连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可能：“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

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21]

至于什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除了“是追求对资本的无限积累” [22] 以外，我们很难找其他的描述。其实这个“规律”并不需要什么繁琐的“世界体系”理论方能解密，它就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但是基于这个规律，世界体系论者得出以下的结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心地区的少数人占有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多数人的劳动。如果中心地区变成了由多数人组成，也就不成其为中心地区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决定了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 [23] 读者请注意，“永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近 10 亿的人口比中国“巨大”的人口相差并不远。由于至少世界上有 80%左右的人口目前还不是中国人，不知中国的哪位统治者会搭理这样的高论，停止自己迈向“中心”的步伐？

那么到底当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当今世界的矛盾到底是用“中心、外围”的对立来描述好，还是用“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的对立来描述好？

“中心、外围”论是个定“量”而非定“性”的，或以人均 GDP 指标的“量”定（中心、外围）“性”的分析框架，因而它会阻碍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进而误导我们走向荒谬。比如，单从长相和是否会飞来看，蛆和蚯蚓“明显”地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不会飞的物种，而会飞的苍蝇和蜂鸟看似属于另一类的物种。同样的，世界体系论者全然不顾日本的垄断资本结构在二战前后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荒谬地把战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连同中东那些除了石油以外一无所有的封建王国统统地划分为“半外围”国家。这就是单从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出发的恶果。由此可见，世界体系论仅仅在外表上有一些相似马列主义的说辞，却是个很不彻底的马列主义，是个倒退。

由于马列主义不光是在理论上的彻底胜利，而且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实践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成员不惜重金扶持一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以便寻找应对措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形色色现代修正主义的起源之一。

歪曲、篡改、阉割马列主义的革命性是这些御用文人的“神圣”职责。我们那些在西方学府任教的进步学者，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否则很容易由马列主义者脱变为“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

世界体系论就表现了非马列主义的学者不得不向马列主义做出的一些让步。它参杂着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喜欢就事论事，喜欢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并且试图通过罗列这些现象来解释现象，使用的是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但是它把握不了帝国主义的“DNA”。

明明当今的“中心”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外围”主要是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不疼不痒的，貌似客观的词汇？

资产阶级的学者喜欢用“贫穷、富有”的对立来解释各种社会矛盾，有些甚至对社会贫富的高度差距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拒绝用劳、资的阶级对立来解释贫富差异的根源。前者是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并往往解释贫富的差异是由勤奋的差异所致，后者才是马列主义的，并解释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差异所致。

同样的，“中心”与“外围”的二分法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并归结于“中心”创新和掌握技术的能力所致。因此，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善于表述对帝国主义的愤慨，却回避帝国主义的实质。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社会阶层用家庭收入来划分“富人”、“中等收入”和“穷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心”=发达=富有；“外围”=欠发达=贫穷。还有什么方法比这种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看似高深的“中心、外围”方法更庸俗？这比同义反复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没有钱”高明在哪里？

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 60 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出发、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出发来看问题的。这些基本矛盾就是以上分析过的：1) 国际、国内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2) 国际垄断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3) 一国资产阶级内部以及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等等。

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或逻辑就是资本要么积累、扩张，要么死亡，因而资本的积累必须发展到垄断资本。这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离开了以各国垄断资本所能够掌控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划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我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列主义的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至此，我们看到了世界体系论的致命错误。

世界体系论家，尤其是该理论的鼻祖沃勒斯坦一再强调，在研究现代世界时，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而不是以国家或地区作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单位。这种看似更全面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实质。

恰恰相反，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的分析单位，如前所说，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功能单元上，即资本集团，以及为此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整合资本的能力。

因此，世界体系论的那种以就事论事的现象归纳法为核心的“中心、外围”论的分析框架忽视、回避垄断资本集团的力量便无助于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更深刻的认识。

(四) 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世界体系论的错误或于这些超帝国主义论者对美帝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出于该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他们光看到了美帝自我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以为美帝以往不光是“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而且他还是在力图“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雷锋”式的力图“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美帝在这种人的笔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多么优秀的领袖！美帝的没落对“世界体系”的维护该是多么大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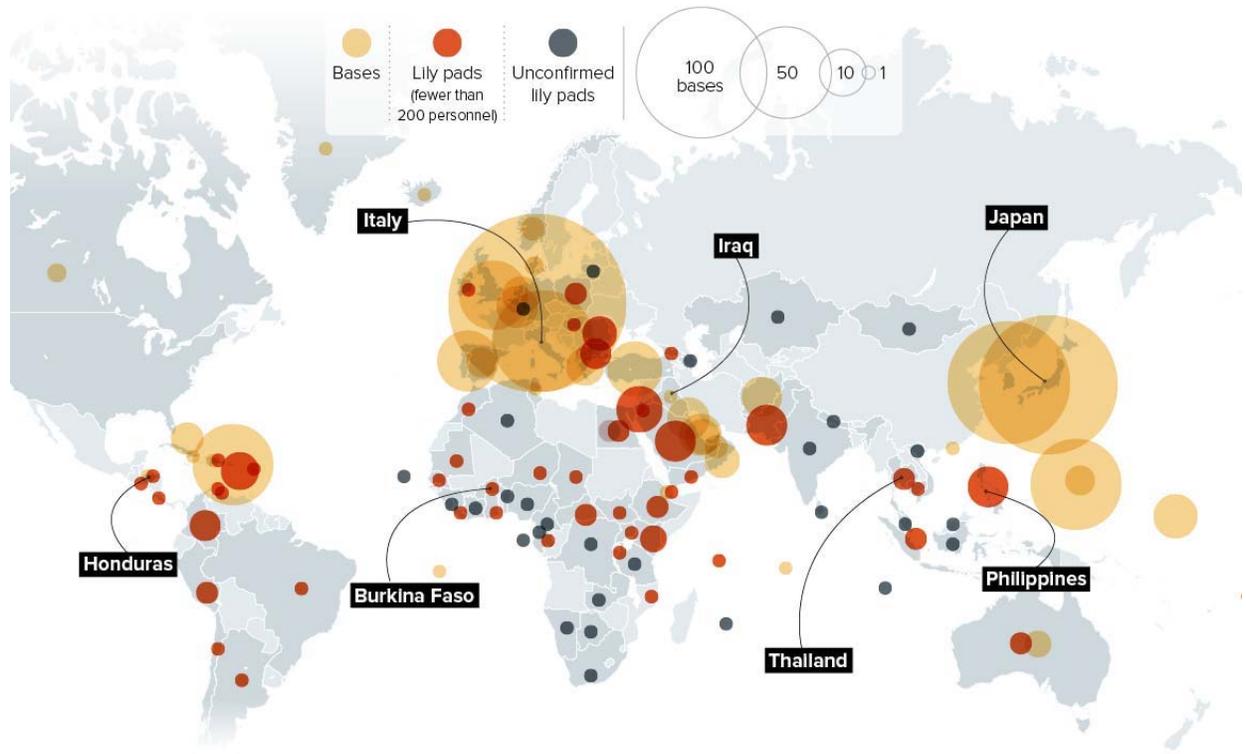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帮助”过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的经济危机。就连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为了克服美国自身的生产过剩，为了美国的资本输出服务的。美国一向善于要么像 2008 年那样转嫁危机，要么像 1997 年亚太金融危机那样去制造危机。美国从来就没有维护过什么“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从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 1971

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来决定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要维护。川普的“美国优先论”是美国一贯的行为准则，只是他把不该公开讲的话讲出来了而已。

资产阶级的学者否定国家的存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一再的强调一个貌似“中立”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对治理社会的必要性。世界体系论同样的强调“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是美帝维护的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只有在不违背美帝的全球利益，即各国列强承认美国霸主地位的前提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的结局，美帝才会与其他垄断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做出有条件地妥协。但是，一旦经济危机发生，美帝转嫁危机是主要对象往往就是其他发达国家。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欧盟的主权信贷危机和日本近25多年经济的疲软都是美国转嫁危机的后果。

美军在世界的布局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在60多个国家有军事基地，150多个国家有军人驻扎[24]，维护的不可能是全球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否则，为什么美国的海外驻军(见图二)主要的集中在发达的西欧和日本?美帝国主义遍布全球的、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主要对付的显然不是各国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各国垄断资本势力。

下面的图二和图一有一个共同点，即：世界500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美帝国外驻军最集中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一再的挑衅早已基本上瘫痪了的俄罗斯，为什么非要迫使北朝鲜走上拥核的道路。没有来自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威胁，美军驻扎西欧和日本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西欧和日本垄断资本严重地挑战。美国需要敌人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军工综合体，更重要的是为了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帝的其他垄断资本势力。



图二、美国的全球军事布局,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6/us-military-bases-around-the-world-119321>)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一) 天朝的国际地位

首先，在军事上，中国享受着完全的主权。相比 G7 成员欧盟的多数、日本等有美国驻军的国家，以及那些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仅仅靠依附于发达国家提供军火的落后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在军事上的主权地位是和俄罗斯相当的。

以军事主权为后盾，中国在政治上也享受着完全的主权，不像 G7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制约。

有了军事和政治的主权，中国在经济上仅仅是有条件的融入了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如 WTO）。

(二) 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令西方资本担忧的不是中国私人资本的高速增长，而是国有资本的强劲扩张。前面所列举的中国资本与其他世界 500 强中的对比，基本上都是国有资本。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和需向私人资本负责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西方列强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集团所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相比之下，天朝国企的实际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是资本的公仆而是国有资本的主人，他不需要向自身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但是，为了权衡国有资本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益，为了防备垄断性必然带来的寄生性和寻租行为损害此集团的整体利益，国有资本集团有意识的把自己在各个领域掌控的商业和企业拆分成几个表面上相互独立的、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公司。能源上有中石油、中石化等，航运有国航、东航和南航等，金融有 5 大行，通讯有联通、电信和移动，等等。

但是这些公司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为了国有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些公司有可能被重新拆分或组合。比如，铁路装备公司十多年前拆分成南车、北车，2015 年为了“走出去”又合并在一起。再有，为了更好的协调国有资本集团下属公司之间的关系，国资委 2015 年 7 月 20 日宣布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铁物、中国普天的人事调整，各公司一把手轮流对调。类似的调整不是第一次。为了防备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公司之间的过度竞争，国资委 2004 年 11 月 1 日一声令下，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是同日换帅。这类调整在西方相互独立的资本集团之间是不可思议的。

在私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美、欧、日帝国内，党、政、军、企、商还是相对独立的，2008 年华尔街的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就是一例证据。相比之下，2015 年 7 月初国务院一声令下，国企集体救市。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办到的。这就是“特色”资本主义的“特色”所在。

(三) 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人们往往忽略了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这一基本事实。既然中国在崛起，我们就尤其有必要探讨这个资本集团的性质，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经济基础和清晰的说明他的基本属性。从资产报表（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资本的垄断（以资产量衡量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西方任何单一资本集团。

非金融业		资产		金融业		资产	
美、欧公司	排名	百万美元	万亿元	美、欧、日财团	排名	百万美元	万亿元
通用电气公司	26	492,692	3.20	房利美	40	3,221,917	20.94
大众公司	7	414,858	2.70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191	2,654,413	17.25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	5	340,157	2.21	日本邮政控股公司	37	2,597,856	16.89
埃克森美孚	6	336,758	2.19	汇丰银行控股公司	68	2,409,656	15.66
威瑞森电信	30	244,640	1.59	摩根大通公司	55	2,351,698	15.29
苹果公司	9	290,479	1.89	法国巴黎银行	39	2,166,092	14.08
沃尔玛	1	199,581	1.30	美国银行	64	2,144,316	13.94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23	402,672	2.62	房地美	124	1,986,050	12.91
<u>中国国企</u>				<u>中国金融业</u>			
中石油	3	621,242	4.04	中国工商银行	15	3,420,257	22.23
国家电网	2	478,539	3.11	中国建设银行	22	2,825,781	18.37
中石化	4	317,006	2.06	中国农业银行	29	2,739,835	17.81
移动	45	251,113	1.63	中国银行	35	2,589,565	16.83

世界 500 强（2016 年版）的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按资产排列对比

但是，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止到 2014 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02.1 万亿元，其央企资产总额 53.7 万亿元，地方国企资产总额 48.4 万亿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来，就单个上市公司来说，国企已经和美、欧、日的资本集团属于同一个等量级的公司。但是与美、欧、日资本集团之间相互独立的状态全然不同的基本事实是，所有 500 强上榜的国企都是国资委的下属公司。因而他这种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经济实力超越了欧美日的任何单一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导下，国有资本集团直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他可以直接调动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暴力来为自己的资本扩张服务。

该集团的实力体现在其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行业	航天军工	能源、化工	工程建筑	材料	汽车	高科技	通讯	交通	其他制造业
美国	6 48%	15 16%			2 12%	14 44%	4 44%	6 38%	5 35%
西欧	1 4%	22 30%	3 15%	6 35%	10 37%	4 4%	7 22%	8 37%	5 29%
中国	6 48%	23 35%	8 77%	7 46%	7 14%	13 22%	3 15%	3 19%	6 28%
日本		6 4%	1 4%	2 11%	10 29%	7 14%	3 16%	1 3%	1 4%
其他	0%	21 16%	1 3%	1 7%	5 8%	6 14%	1 4%	1 3%	1 4%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表四中，除了高科技似乎没有国企以外，其他上榜的基本上都是国企。虽然在技术上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基于国企雄厚的资本实力，通过购买或砸钱的方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的消除。

由于这几年严重的生产过剩，国有资本面临着强大的“走出去”的压力，今后海外资本的比重会不断地上升。他正在努力的改变这一资本过于集中在国内的弱点。因此，近年来，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增长趋势令西方国家担忧。中国对亚非拉和欧盟的资本输出是典型的，实实在在的资本输出，而且基本上全是非金融投资。从 2015 年起，中国对外的非金融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在中国的非金融投资。[25]

看不到国有资本集团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看不见带领中国资本崛起的核心力量是国有资本集团，就看不懂中国资本为何能够崛起，而其他比如印度、巴西没有崛起的可能。

除非国有资本集团自己的崩溃，他不和世界霸主争夺霸权的可能性有多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四) 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中美今天的关系当然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不会争霸。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在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下继续地发展，他一定会试图改变这一体系。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独立自主的，尤其是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在逐步增强。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北约等方式牢牢的控制着其他发达国家的军事，通过军事美国轻易的操控着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

这里说的“争霸”指的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这个挑战明显地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达到了当初苏联挑战美国的地步。

即便是这样，中国对美帝世界霸权的挑战和 80 年代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挑战，欧元对美元的挑战等等不同。虽然都是帝国之间争霸的表现，但是由于日本、欧盟缺乏军事上的独立性，和由此所造成的政治上独立性的欠缺，因而无论来自日本还是欧盟的威胁，美国都会通过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搅局，把他们对美国的挑战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在 80 年代也大量渲染日本威胁论，然而后来都烟消云散”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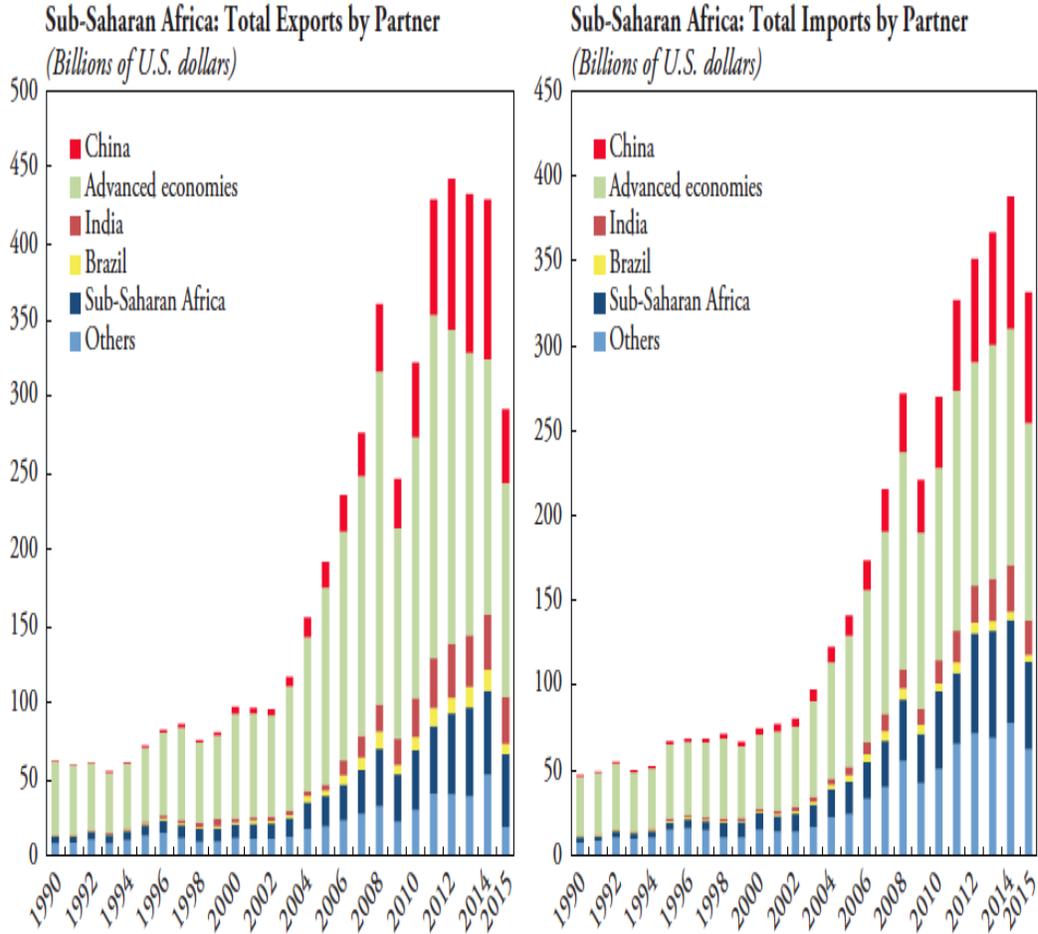
中国的挑战不同。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保证了他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挑战不容易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因而“中国威胁论”的结局也会和“日本威胁论”全然不同。这是美帝最担心的问题。

美国对谁在威胁自己的霸权应该是看的最清楚的。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他无法用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抗衡中国在比如非洲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他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他最后的霸权手段：即赤裸裸的军事霸权来抗衡自己的对手。

(五) 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以下的数据证明西方的担忧不是无稽之谈。虽然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在快速增长以后的今天仍然只占有所有实际外资额的 5% 左右[26]，但中非贸易额的增长却远远超出了投资的增长。

2017 年 IMF 的研究报告《中国与非洲的再平衡：中国再平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增长的影响》指出：“1995 年，发达经济体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口总额的近 90%，但 20 年后，包括巴西、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伙伴占了 50% 以上，其中中国又占了这个的一半左右。” [27]该报告中的下图表明中国已经成为（黑）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Source: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图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出口贸易国分析（IMF 报告）

此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黑）非洲地区的外债总额已从 2005 年的不到 2% 上升到 2012 年的约 15%。”同时，“到 2013 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工程合同都在（黑）非洲地区。”

该报告还分析了贸易的结构，称：“至 2014 年，中国是（黑）非洲的全球最大进口来源国。燃料、金属和矿物产品占（黑）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的 70%。（黑）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其后是机械品。”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列强与第三世界国家贸

易的构成。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布鲁金斯学会 2015 年的报告《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现实与神话》也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西方列强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28] 遗憾的是，我们一些熟悉非洲情况的左派学者，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不是从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出发，而是在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下，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在后殖民的全球体系中，一个半边缘的经济与边缘经济的关系。” [29]

然而，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国正在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除了在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以外，为了保卫自己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和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以维和的名义，中国已经破天荒地第一次派了武装部队去捍卫当地油田的安全。

正像 IMF 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通过使贸易伙伴多样化，（黑）非洲减少了其出口的波动性”，因而中国的资本正在逐步的打破西方列强对非洲的垄断。

虽然西方列强大喊“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但是西方列强毕竟对谁在真正的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比我们这些书呆子、知识分子和局外人强得多，快得多。他们恐惧的不是大量来自中国的小商小贩，因为来自印度的小商小贩人数在非洲可能比中国的多，却没有听说过谴责印度新殖民主义的言论。他们谴责中国大资本挺进非洲，按照英文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贼先识贼”（It takes one to know one），或通俗的讲就是骗子最善于识别伪装起来的骗子。

没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造成西方列强的恐慌感和对中国的谴责。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如此的明了了，美国在非洲担心的已经不是来自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的挑战，不是来自其他任何老牌帝国的挑战了。

(六) 历史的教训

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尤其是与日本就谁控制朝鲜半岛的 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侵略和压榨的穷国。但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加上近 40 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他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展现出一个剧烈的转变。

历史上这种巨变的先例很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其 1890 年代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今天中国也超过了美国。1900 年代美国只剩下 50% 人口从事农业，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从 2000 年起就不足 50%。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德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也是同样的要一方面对付相对强大的欧盟、日本，另一方面要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

基于中国的历史，如果我们多多少少地从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替中国资本在国外的“不平等”遭遇打抱不平，为其说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是从马列毛主义出发，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视角看问题，那么那些替新兴帝国对外扩张辩护的说辞还站得住脚吗？其立场在哪里？

我们有一位学者就形而上学地说：对外投资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者乃帝国主义。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属于等价交换，谈不上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还没有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他的另外一个奇谈怪论：由于中国输出的资本纯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且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人民，因而他和一般帝国主义早期资本输出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不是为了解缓生产过剩，不是为了寻找资源和市场，而是为了完成战略目标，包括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率的目的而进行的。[30]

这位先生为中国资本输出在国际上的遭遇喊冤叫屈的行为与一战前第二国际的那些“左派工人领袖们”，如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类的诡辩有何区别？当时英、美、法、德帝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起先也是从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获得的，且英、法、德国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西方的“民主”手段，看上去更是“属于英、法、德的人民。”

一个受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怀，就其反帝性来说，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如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话）。相反的，一个帝国的民族主义，由于他是建立在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反动的。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反霸的愤慨不多，争霸的狂妄不少。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正在由进步走向反动。

在国际关系上支持弱肉强食（即帝国主义）的人在阶级关系上也会同样地容忍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榨。

从政治上来讲，祖国是一个捍卫自己权利的国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垄断资本投资无国界，但是华为的海外利益不能靠美国的舰队，苹果的全球投资不能靠中国的航母。因此跨国垄断寡头资本必须以祖国为靠山方敢投资四海。

六、结束语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2016年10月第一稿

2017年9月第二稿

注释：

[1] 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消耗的价值，即其工资，但是资本家通过工资所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所能够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资代表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像耕牛的价值是由饲养耕牛的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耕牛所能做的工决定的一样，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

[2] 参照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列表6-2

[3] 也就是说，活劳动是有机的，资本是物化了的无机劳动，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因而越是资本密集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总投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利润率就越小。

[4]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2015年，第一章

[5] 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156个援助项目，在专家撤走之前，才是没有保留的技术转让。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少走了十年、二十年的积累过程。今天世界500强的所在国，没有一个会像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或毛泽东时代援助亚非拉国家那样无保留地通过技术转让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6] 远航一号：《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6日）

[7] 程广胜：《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3期（2015年9月2日）

[8] 这是金融资本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些把更多的控制权转让给金融资本的资本集团会有更快的资本扩张，直到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太上皇。

[9]<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717>

[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6xuv.html

[11] 远航一号：《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8期（2015年2月24日）

[12]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第七章

[13] 远航一号：《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2期（2015年8月20日）

[14] 马克思主义100讲：《【第4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网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8&page=3>

[15] 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每月评论》2015年7月
<http://www.cwzg.cn/theory/201509/24539.html>

[16] 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时事出版社，2004

[1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8]<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4225>

- [19] 刘涛在《中國崛起策》第 40 节中列举了很多使得“中心、外围”论很尴尬的现象。
<http://read.jd.com/5057/263915.html>
- [20] 李民骐：《“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阶级斗争》红色中国周刊第 44 期（2014 年 11 月 24 日）
- [21] 远航一号：《21 世纪与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网，2014-3-13，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17299>
- [22] 马克思主义 100 讲：《【第 5 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93>
- [23] 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 世纪大众的经济学》第 18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
- [24]<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worldwide-network-of-us-military-bases/5564>
- [25]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6/11/01/chasing-chinas-outbound-direct-investment.html?utm_source=iContac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sia%20Briefing&utm_content=AB_Flyer_Nov22016_USWest
- [26] 该数据来自下一个注脚，而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成为非洲 FDI 最大来源国”的报道包括了比如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非埃及的 200 亿美元房地产投资意愿（占全非洲 FDI 意愿的 22%），并非实际投资额。
<http://forms.fdiintelligence.com/africainvestmentreport/?ref=TIA>
- [27] IMF A Rebalancing Act for China and Africa:The Effects of China’s Rebalancing on Sub-Saharan Africa’s Trade and Growth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 [2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amp/>

[29] 严海蓉, 沙伯力合著《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 第一部分: 《中国、非洲、西方及殖民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5月1日, 摘要见:

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contentId=7101107&contentType=literature&type=%25E6%258A%25A5%25E5%2591%258A

[30] 卢荻: 《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 》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

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

远航一号（2017年9月，红色中国网）

话实先生的数万言长文“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发表在激流网上。在这篇长文中，话实先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他所理解的（或者他所歪曲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且用了不少的篇幅批判了远航一号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关于中国前途的一些观点。

在话实先生看来，中国资本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事实，而中国资本中最大的集团便是国有垄断资本集团，这个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扩张中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进而展开争霸斗争。面对着这样的中国资本集团越来越强大的“事实”，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可以做些什么呢？话实先生的口号很响亮：“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资本集团确如话实先生所说的非常强大，并且正在成长为霸权，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客观基础又在哪里呢？话实先生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动力又在哪里呢？既然在历史上英国的无产阶级、美国的无产阶级、德国的无产阶级、日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争霸的过程中或夺取霸权以后都不曾反对霸权，或者局部反对而后失败，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霸权呢？为了将来的壮烈的失败？

表面上，话实先生声嘶力竭地批判民族主义，但是话实先生对于中国与世界实际状况的认识有哪一个重大的方面，是区别于“工业党”、“强国派”分子的呢？两方面都认为中国资本集团空前强大、越来越强大，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对外扩张，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与美国争霸并有可能夺得霸权。话实先生文章的“受众”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话实先生冗长晦涩的文字，劳动者是看不了的），“工业党”、“强国派”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么，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中，话实先生除了他自己认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感以外，还有哪些优势呢？话实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能当饭吃吗？

所以说，话实先生数万言长文的营养 = 零。

不过，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话实先生的长文也并非一无用处。话实先生的诸多错误，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目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中相当流行的。这些错误观点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当前阶

段特点的反映。透过这些迷雾，我们才能看到那隧道尽头的光明，识别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帝国主义和战争

既然说到帝国主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在列宁看来，十九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而大量输出资本。这种资本输出为垄断资本家带来了“超额利润”，并且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了“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事实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请话实先生注意，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培养的“马列主义研究者”的发明，而是列宁的观点。虽然列宁当时仅仅提到了“工人贵族”，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多数被改良主义夺取了领导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当时恩格斯在通信中已经提出过整个的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问题。全世界无产阶级当然要联合起来，但是不是通过否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客观上占有了一部分世界剩余价值这一世界历史事实。

列宁并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获得资本输出的场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瓜分世界，并将广大的亚非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或曰资本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必然要为了瓜分世界而展开斗争；又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当这种要求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必然爆发战争。

如话实先生所承认的，自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以来，世界历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也没有爆发过战争。如远航一号在另外的文章所说明的，近年来，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举全国之力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更不必说主要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头号霸权国家与若干中小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在这些战争中经常被当地人民群众所打败）。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大可能将对外战争作为实现本阶级利益的一个主要手段。

话实先生承认不承认这一新的历史现实呢？他是坚决不承认的，但是又好像羞羞答答地要承认。

话实先生用了一大段篇幅引用了远航一号的一段论述，其中说：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然后，话实先生故作惊诧状：“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

姑且不论，中美两国资本集团之间到底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请话实先生回答，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是否符合近年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是否很有可能也符合可预见将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

对此，话实先生先是以小粉红般的热情、《环球时报》般的政治正确为中国的崛起而惊叹：“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咱们姑且就把这些赔本赚吆喝都当作是对美帝的挑战吧。但是我们知道，话实先生所追求的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不是中国霸权。那么，话实先生接下来的结论就不能不令人沮丧了：“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就是说，无论争夺如何“连绵不断”，南苏丹、缅甸有哪些内战（是否“替代战争”另当别论），军备竞赛如何热闹，中、美之间终究是“不易发生”直接冲突的。

既然如此，话实先生，你费了那样大的力气，批判了几个理论体系，除了得到事实上与“小粉红”们完全一致的中国强大论，又在事实上承认了远航一号关于“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论断以外，还剩下哪些有那么一丁点用处的东西？

相比之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论证帝国主义争霸，而是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使得“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从而造成“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条件。

而在话实先生的洋洋洒洒中，帝国主义链条处处强大，无产阶级除了正义的词汇不剩下任何实际的力量。话实先生，你是在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写作，还是在为论证帝国主义坚不可摧而写作呢？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如话实先生所说，世界体系学说确有不同的门派，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这也并不否认，这些门派相互之间仍然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但是，像话实先生那样来概括世界体系学说基本观点的倒是真正的别处心裁：“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60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话实先生的逻辑理解能力真是妙不可言。世界体系理论家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霸权在客观上起了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同利益并促进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在话实先生看来，这就是认为“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照此逻辑，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起着进步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合理的”了？

按照话实先生的见解，美国霸权就只能是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而绝不可能是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照此逻辑，不妨说，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决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乃至任何一个阶级的个人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绝不可能有阶级意识。话实先生，你的这种国际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呢，还是资产阶级“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

话实先生说，世界体系论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恰恰相反，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是目前世界上著名社会科学家中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造成其“结构性危机”并必然导致其灭亡的少数几人之一。沃勒斯坦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而话实先生事实上所主张的帝国主义越来越强大的观点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主义危机

话实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混乱。

在话实先生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生产过剩，其他一切危机理论都是错误的。

有一定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知道，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如果说，一切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从而只要消除生产过剩，便能消

除经济危机，这并不比医生说一切疾病都是感冒发烧引起的高明多少。就经济思想史来说，这无非是抄袭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学说而已。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然意味着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够通过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支出以及资本家的消费支出而得到实现。那么，资本家为什么不愿意维持（或扩大）投资支出的规模呢？显然，这个原因，只能从生产过剩以外去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必然产生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引起积累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积累危机的历史现象。对此，话实先生向来是视而不见的。

那么，对于马克思的著名的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话实先生又为什么完全回避呢？（除了提到不平等交换可以部分抵消利润率下降，但在探讨经济危机时则完全忽略）

大多数主张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主因的理论家，都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所导致的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话实先生又很自信地摒弃了消费不足危机说。

按照话实先生的独特而别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危机只能由生产过剩产生，因而一切看似可以消除生产过剩的变化，包括技术革新、商品输出，乃至战争和自然灾害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认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可以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减少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就没有了，这就是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你能不能向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吗还是别的什么过剩？如果是相对于需求过剩，那么有哪一种经济理论告诉你，当你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的时候，需求是可以不受影响、固定不变的？你消灭了一部分生产能力（不是闲置，是消灭），收入或者财富不会减少吗，需求不会下降吗？

确实，历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生产能力，而是因为战争期间政府军事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得原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动员（像美国这样本土没有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生产能力还大大增长）。

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

无论如何，按照话实先生的观点，既然经济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那么几乎任何社会和经济变迁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进而克服经济危机。既然如此，经济危机除了充当资本主义定期的健康检查以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资本主义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于是垄断资本便征服海外市场，经济危机就克服了。垄断资本要征服海外市场，相互之间当然会发生冲突，于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要争霸。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有核武器，所以争霸也不会导致战争。那么好了，争霸的结果，无非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越来越受压迫而毫无办法，资本主义天下永远太平。这便是话实先生混乱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

话实先生不仅认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并且认为生态危机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按照他的生产过剩唯一危机说，生态危机因为会促进环境保护投资，还会帮助克服生产过剩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关系，近年来，《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多有著述。福斯特明确认为，疯狂的、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结果，将颠覆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人类已经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历史关头。

话实先生对于《每月评论》是熟悉的。我建议，话实先生将自己关于生态危机无关紧要论的观点发表在《每月评论》上，一定会引起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视。

话实先生与小资产阶级左派

让我们看看话实先生的长篇巨著最后得出怎样的结论吧：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口号的背后呢？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美帝国主义有核武器，“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所以，在美国人民“觉醒”之前，一切、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美国人民什么时候“觉醒”，这是一个类似于植物人何时苏醒的问题。

这是话实先生长期以来失败主义思想的总暴露。这种失败主义，并不是话实先生个人的，而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所共有的。

近年来，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老革命、老工人长期坚持斗争以外，大量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在向马列主义左派靠拢。这些新加入左派队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小资产阶级，或者在事实上拥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大批小资产阶级被排斥在优质劳动力市场以外，出现了边缘化、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政治激进化的客观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的思想左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个人前途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廉价同情。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资本到处都很强大，而劳动解放只能是遥遥无期。

他们不懂得，任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的社会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而一定社会的发展往往会破坏它自己赖以存在的条件。他们不懂得，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小的可以变成大的，弱的可以变成强的。在他们看来，现在强大的便只能永远强大下去，现在弱小的便只能永远弱小下去。未来的世界，工人阶级只能是配角，资本和帝国才是主角。

他们不认真学习伟大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不重视中国劳动群众自己的斗争传统，而对外国一些屡败屡战的“经验”却津津乐道。他们不努力学习整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以及世界上最新的进步和革命思想，而是将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局部经验奉为不可颠覆的教条，用最革命的口号来掩饰自己最低落的信心。

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如果不摆脱这种被小资产阶级左派统治的状况，是必然不能够进步的。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也必然能够摆脱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使得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代表。

谈“中帝论”破产了，还是“中帝”破产了？

和尚（2018年7月，中国红旗网）

最近，红旗网转发井冈山卫士网友写的一篇文章《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对特色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特色中国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作者说：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所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工作。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有人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自己发明一套“核心外围”理论，来论证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历来有不同认识。列宁和考茨基的分歧就很大。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而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

作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没有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仅仅从中国资产阶级在中美争霸中采取了“妥协投降路线”，就否定中国是帝国主义。作者说：在中美“贸易战”中，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

立场。中国资产阶级一溃千里，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因而得出结论：中国不够“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实行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是资本由上升阶段，开始下行，进入衰亡的历史阶段。列宁还一再强调，即使在帝国主义阶段，不排除某个历史时期，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会更快一些，超过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帝国主义的“贸易战”是特色垄断资本与美国垄断资本的争霸战。在争霸中特色采取妥协退让，和谐共荣，还是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并不能决定特色的社会性质。决定特色社会性质的是特色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是否达到了垄断，腐朽，垂死程度。

不能像某些人所说，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讨论特色社会性质就是“机械照搬”，按“核心外围理论”就是实事求是，创新发展。作者认为承认特色是帝国主义，就是承认中国资本“强大”，就是高看了特色资本。恰恰和作者的看法相反，帝国主义不是什么新生的事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说特色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不是高看了特色，看伟大的特色，而是看穿了特色，看透了特色资本纸老虎虚弱的本质。特色是垄断腐败没落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对特色资本主义在战略上的藐视。另一方面，承认特色中国垄断资本主义是血腥镇压，残酷剥削人民的帝国主义真老虎，这也不是害怕特色，而是战术上重视敌人，坚持持久战，决战条件不成熟，不要盲动。

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中国资产阶级的垄断性，从每年资本主流媒体公布的《财富》世界五百强的名单和资产就可以一目了然。在2017年，中国有115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其中，国有企业占较大比例。入围的中国企业数量比上年度增长五家，中国公司入榜数量连续第十四年增长。据了解，《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垄断公司的榜单。当垄断企业在一年中的总营业收入达到216亿美元以上，才有可能跻身到2017年的榜单中。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基本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从数量上看，中国上榜垄断企业仅比美国少17

家，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前十名中美国垄断资本 4 家，中国垄断资本 3 家，德国，日本，荷兰垄断资本各 1 家。这些资料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因此不过多引用。

这些实事说明特色中国垄断资本虽然质量上比一些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还有差距，但是数量上已然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垄断代替自由竞争。

特色帝国主义除了垄断，还有腐朽垂死的特征。中国贪官的数量，贪腐的程度，也和特色中国的 GDP 增长成正比，和资本崛起的体量匹配，充分显示出特色资本腐朽发展速度。最能反映特色资本垂死性的一个经济指标，就是国内维稳的费用超过对外的军费。国内工农兵维权，罢工，集会，游行，上访，暴力反抗的事件数量，全世界名列前茅。特色资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举家移民，担心“无法无天”的“共匪”再回来“杀富济贫，共产共妻”。特色资本的腐朽还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看看中国特色资本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的主流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明星大款群魔乱舞，看看中国特色资本的教育产业，以出卖文凭为教育资本第一核心商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孔孟之道，如今又被特色资本抬出来，供起来，还用中国老百姓的钱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院，毒害世界人民。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和为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资本醉生梦死，活过今天，不知有明天。

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说要“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可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与资本私有制的矛盾只字未提。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作为主要矛盾论述。而是大谈核心国家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矛盾。

作者说：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

作者对帝国主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整篇文章不敢提帝国主义。明明是中美新老帝国主义之间争霸，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却独出心裁创新发展出什么核心国家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不平等交换。这里有两个错误需要指出。第一，商品经济社会，商品按价值交换，违反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不能进行，就不能形成商品经济。其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斯密开始，到作者写文章时为止，其理论基础都是商品按价值规律“平等交换”。正是在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的“平等交换”中，实现了劳动力价值，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产生剩余价值，资本才能无偿占有劳动力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在各个不同种类的资本中的占多少比例，是资本按数量大小和价值规律分配的结果。如果个人敢于违法，或进行不公平交易，会受到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法律制裁，或价值规律的惩罚。请问作者：什么是不平等交换？无产者出卖劳动力得到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交换，平等吗？劳动力商品按价值规律进行商品交换，按所有资本主义包括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进行劳动力商品交换，合理合法吗？作者以资产阶级商品交换中体现出的平等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讨论所谓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不平等交换问题，追求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等等资产阶级法权，殊不知这些私有制产生的“平等”东西，正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资本主义权利。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就是说这种资本主义已经走向腐朽衰亡，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和胜利的时代，这时还要追求资本的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世界，不觉得思想与现实相差太远了吗？

作者还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作者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外围论观点”，否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封杀了“中华帝国主义论”，“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不过，帝国主义在世界到处侵略燃起的战火，枪炮声，贸易战，关税战，打破了作者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萧墙之内”的沉静，响彻云天。中国吃瓜群众已经看到了比世界杯足球赛还激烈的国际垄断资本争霸大戏，更精彩的“战争与革命”的好戏还在后头。

作者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说：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作者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是，社会现实不完全像作者所描述的：“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一步步加强，一天天残酷，造成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斗争造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有利于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形势。

尽管作者全文没有说明特色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垄断腐朽垂死的，但是，坚持说：“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确实，特色中国不是“伟大的帝国”，“同治中兴”。特色社会主义是垄断腐朽垂死的“三流帝国主义”，“婊子小三帝国主义”。

作者的“核心外围理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理论。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因此，说明不了 21 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情况。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说：首先我们要感谢“话实”和“寒流急”同志的辛苦劳动，没有他们的两篇文章，我们将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倾向各异的表述中找出“中华帝国主义”的系统论述。

作者还说：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中已经对“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争霸战争理论、

生态环境危机理论做了批判，在这里就不必赘述。本文主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的观点。

既然作者还没有搞明白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搞不明白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更无法明白中国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即使作者提出前途方针策略，也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

和作者看法差不多的某些朋友说，当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要先争取到资产阶级民主，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然后再进行新社会主义革命。据说这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指引中国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最正确的“新时代”理论。

因为朋友们希望继续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故把以前发在红旗网上的，对特色帝国主义的看法，结合井冈山卫士网友的文章又唠唠叨叨重复了一下。没有更新观点，还是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虽然 21 世纪是互联网信息经济新世界，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篇一百年前的文章还有旺盛生命力，还在大放光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确分析了革命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由弱变强，打败了封建主义，然后又从自由走向垄断，腐朽，衰亡，反动，由强变弱，被无产阶级革命打败，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历史规律。马列毛主义理论一旦被人民掌握，就能变成改天换地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历史作用。也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学习，宣传，实践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原因。

今天，社会现实，不是某些人说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破产了，而是资本主义自己走向历史的反面，终点，破产，灭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生死有命”，“物质不灭”，是自然规律。中国特色帝国主义破产了，怎么能怪《帝国主义论》呢？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批评，批判。

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 ——与中国红旗网评论员“和尚”同志商榷

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经红色中国网龙翔五洲、野火两位网友介绍，读到了中国红旗网评论员“和尚”同志对首发于红色中国网的《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一文撰写的评论文章：《谈“中帝论”破产了，还是“中帝”破产了？》。

读后，我们认为，我们与红旗网的同志在许多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和尚”同志认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对此，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与“和尚”同志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也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领导和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并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点，我们想，“和尚”同志也是同意的。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逐段引用了“井冈山卫士”同志的一些观点以后，“和尚”同志还会认为：“既然作者还没有搞明白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搞不明白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更无法明白中国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即使作者提出前途方针策略，也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和作者看法差不多的某些朋友说，当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要先争取到资产阶级民主，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然后再进行新社会主义革命。”

“和尚”同志在这里引用的观点，也叫“二次革命论”，是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和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其他同志明确反对的，远航一号曾多次、公开地批驳这种认为中国应首先争取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错误观点。“井冈山卫士”同志的文章，虽然并不是针对“二次革命论”的，如果“和尚”同志能够更为仔细地阅读，也不至于将其误解为是在宣传“二次革命论”。

“井冈山卫士”同志虽然没有点名批判“二次革命论”，但是明确批判了与“二次革命论”有密切关系也为相当一部分“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所信奉的“独立工会论”。所谓“独立工会论”，就是认为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进行广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更谈不上领导革命。只有等到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

自由”，有了合法的、“独立”的工会，无产阶级才能够通过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集体谈判等手段开展经济斗争，然后在某个遥遥无期的未来，政治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提上日程。

“井冈山卫士”同志明确指出，在半外围的中国，这样的“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换言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矛盾，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是不会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的，因而也不会有什么“独立工会”。中国的政治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产阶级足够强大时才能够实现；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果然足够强大时，不仅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无法存在下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无法存在下去。“和尚”同志，这难道是你所理解的“二次革命论”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半外围”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目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而不直接照搬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呢？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毫无疑问，我们都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并且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此，就必须不仅了解以往革命胜利的经验，而且要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知道，在世界阶级斗争的发展史上，欧美无产阶级曾经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早就做过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断。

但是，毋庸讳言，欧美无产阶级在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实际历史发展中并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没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会堕落到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呢？对此，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做过分析，那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从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中攫取超额利润，又可以从这些超额利润中拿一部分出来，赎买本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使之成为“工人贵族”。这在列宁看来，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得以流行的物质基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社会改良，被赎买的不再是少数“工人贵族”，而是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或者如恩格斯曾经评论英国工人阶级那样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资产阶级化了。

另一方面，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似乎一度实现了阶级妥协的同时，世界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了拉丁美洲、东欧、南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些地区的许多国

家阶级矛盾激化并发生了革命形势；其中有的地方，如葡萄牙、智利，几乎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半外围”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国际上的许多进步学者也在积极思考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其中一部分学者，一方面继承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结合新形势下的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特别是结合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的经验，才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核心、半外围、外围等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已经应用于许多国家的阶级斗争实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自己发明的。

那么，为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会集中于半外围国家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有了相当发展，从而无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力量；这些国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相当规模，并且也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与核心国家不同（就是说，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这些半外围国家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攫取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并用来在国内实行社会改良和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是说，他们养不起大量的“工人贵族”，也满足不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民主自由、高工资、高福利的要求，因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频频发生罢工、骚乱、政变，乃至爆发革命。

这与今天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有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想，我们和你们都同意，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也不是半殖民地。因此，以往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的革命经验是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的。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呢？我们和你们都是列宁主义者，都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所有论断都要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来认真体会，不能搞断章取义，不能只从其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一部分，而忘却或抛弃另外一些部分。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用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这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在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中，欧美核心国家事实上用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地区的工人阶级，在一个时期内实现了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一定范围的阶级妥协。

所以，如果如你们所认为的，中国资本主义果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你们就要承认，正如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中国资产阶级将有条件用它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收买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恰恰实现了你们（红旗网同志）所坚决反对的“二次革命论”，而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这，难道是“和尚”同志与红旗网同志乐于见到的前景吗？

我们和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不是在某种想象中的、遥遥无期的将来，而是今天的青年、中年乃至老年同志都可以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并且投身于其中的。中国革命的红旗是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树立于神州大地的。

在我们看来，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这个半外围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有了一个数量庞大并且仍在继续壮大的无产阶级，还有着有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地位，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剥削到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没有条件大量收买“工人贵族”，因而就既不能用社会改良的方法来缓和内部阶级矛盾，也建立不了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条件，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容纳不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斗争力量和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必然不断激化，从而决定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形势；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些特殊条件，这样的革命形势，将无法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而只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附带说一下，“和尚”同志举出 100 多家中国企业加入所谓《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作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依据；这里要说明一下，要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号称“国际垄断”，并且要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大量攫取超额剩余价值，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大量的“营业收入”，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显著超过世界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要像美国的苹果那样，而不是像中国的“中兴”、华为那样，更不是像中国的大量“国有企业”，其利润率显著低于私企、外企的平均利润率。）

所以，在我们看来，将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国家来分析，能够正确地把握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能够说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用其他一些概念，比如套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则不能对这些矛盾和条件加以说明，还会引起很多误解、迷惑和混乱。

此外，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左派同志，津津乐道于“中华帝国主义论”，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是腐朽垂死的，而是蒸蒸日上的，是可以挑战美帝国主义乃至替代美帝霸权的。这些同志，确实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抱有无数的希望，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的。就在“井冈山卫士”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我们对革命前途“盲目乐观”的言论也是不少的。我们想，“和尚”同志和红旗网的同志不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沙皇俄国也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沙俄不仅没有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攫取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并且在经济上还高度依赖英法资本，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我们也认为，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很可能在未来将被证明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但是，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当初的沙皇俄国又有很大的不同，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发达、无产阶级更强大。沙皇俄国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垮台的，今天不存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也不存在中美争霸战争的条件。美帝国主义是在无可挽回地衰落，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任何其他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力量来代替美帝充当霸权并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秩序。还在下一个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产生之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走向灭亡。

正因为如此，“井冈山卫士”同志才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不过是“夫妻龃龉”，无产阶级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掘墓人。

我们本以为，这也是红旗网同志的观点。不曾想，“和尚”同志对于“萧墙之内”的理解却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在世界到处侵略燃起的战火，枪炮声，贸易战，关税战，打破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萧墙之内’的沉静，响彻云天。”难道“和尚”同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萧墙之内”是“沉静”的，不会燃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火，而只能坐等帝国主义的战火来毁灭吗？我们相信，这不是“和尚”同志的本意，“和尚”同志的觉悟应当比一般的“中华帝国主义者”要高一些。

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

何宇（2018年7月，激流网）

目录

-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 五、全面评价井冈山卫士的世界观、方法论、写作脉络和逻辑
- 六、分歧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七、分歧的物质基础
- 八、结论

七月初，井冈山卫士在“红色中国”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现在已经封杀，无法提供网页原件了。在文章第二、三部分转折处，他写道：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

为了避免琐碎而又无聊的争论，我就从正面回答上述问题开始。——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左派同志，也难以有左派同志以我为代表，如若观点一致，纯属巧合；倘若不一，那也正常得很。总之，我也决定以“我”的口吻来写作此文，以免被说成是“绑架”马列主义。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要问某一国家某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该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它的起点条件），其次是它的主要产品和产业分布特征（它是生产什么的，具体又是哪些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乃至更具体更细致的划分，生产性产业、非生产性产业），再次是它的产业份额、产业地位（占多大比例、起多大作用），然后是它的产业生产方式（小生产的、大生产的？自由竞争的、垄断的？本土的、世界的？），最后是在每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考虑它们世界总和的相互关系，并在总和的规定上重新考虑某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确定它在世界总和中的具体地位。

因此，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如从不平等交换出发——这个原理是错的——衍生出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体系的排序，把这种排序特定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因此，也不是说只有井冈山同志才讲“世界体系”、我就不讲“世界体系”，而是我们俩的“世界体系”完全是两个东西。井冈山同志的体系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建立的特定排序的体系、而我的体系却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不是一个抽象原则的关系序列就可以概括的了、把握得了的。

总之，对我而言，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每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确定它们的世界总和，继而又在世界总和的规定下重新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既不是抽象先验的整体主义，也不是狭隘直观的个体主义，而是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这就是我主张的认识资本主义及其总和（体系）、以及总和下的资本主义的方法。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既然我的方法是把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放在具体的历史起点的条件上去考察，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然也就要首先考察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它的产业分布特征、它的产业份额和产业地位、产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以及世界背景和世界影响等，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不是全面论述（我还没这个本事），而是仅仅提出要点，显然的特征是：（1）落后农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2）官/僚/集团垄断政权+（3）改革开放下各种资本主义成分的大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由竞争转向垄断、由实体转向虚拟、由生产性转向非生产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的生产方式新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当前特征，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超出列宁所讲的不平衡性，即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等。而且，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不成比例性和无政府性），更是从一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那种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外不平衡性（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从一般的自由竞争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舞台也进一步从单一国家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是（1）全球性的危机，（2）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意味着它决不是中国一国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范围的事件；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领域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不会只是一种或几种危机形式的爆发。

由此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必然是（1）全球性的斗争，（2）全面性的斗争。

因此，马列主义者仍然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坚持现代条件下一切阶级的政/治/斗争都必然要求政党的原理，从而坚持党的领导下，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一国与世界相结合的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支持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第一，这不是中国一直以来对外关系活动的全部内容（在阳和平老师《[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就已经揭露了井冈山同志未予注意甚至不想注意的具有进攻性的事实）；第二，这（妥协退让）也完全符合中国新兴的、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妥协性、软弱性，丝毫不影响它所同时具有的危险性。相反，它正是在危险中兼有妥协，在妥协中兼有危险。在我看来，如果不警惕和重视中国资本主义可能具有的危险性，那就不可能有效打击中国/资本主义同时具有的脆弱性，而在井冈山同志看来，“重视危险”=“黑云压顶、绝望挣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有“毫无危险、只是脆弱”才=“百川入海、一片光明”。——于是乎，我们也就知道井冈山同志所谓的必然胜利到底是根据什么了，那就是麻痹大意+乐观自负。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我主张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主张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当前特征出发，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具体生产出发。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的问题上，我主张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主张全球性危机和全面性危机。继而在中国无产阶

级的革命策略的问题上，我主张阶级斗争的全面性、政治性、全球性，主张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相统一、合法非法相统一、党与群众相统一、一国与世界相统一，反对帝国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和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在最近现象的认识问题上，我主张妥协退让不是全部，也并不超出中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更不妨碍这个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

那么，我的观点如此，井冈山同志又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1) 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坚持“世界体系论”，指出对某一资本主义的认识必须以对“世界体系”的认识为前提。但是，井冈山同志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体系”的呢？他是从交换，而且是从“不平等”交换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即“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

现在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是什么玩意儿。

在马克思那里，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即工人和不变资本之间具有不同比例，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多、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多的产业，反之，那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少、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少的产业。假如资本都按它们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分配和交换，那么活劳动比较多的产业部门就会得到大量剩余，活劳动比较少的部门就会得不到什么剩余——这难道公平吗？这难道平等吗？显然，对于等量资本取得等额利润的资产阶级基本法而言，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管资本构成是高是低，不管各部门资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所有资本都只能取得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化的利润，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因此，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低，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高；而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高，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低。——但是，不管怎样，高构成资本和低构成资本在这里得到的终究是“相等的”利润和“相等的”利润率，高构成资本并不比低构成资本多得剩余价值，低构成资本也并不比高构成资本少得剩余价值。——因

此，有机构成的高低根本不影响资本交换的平等或不平等，它与资本之间的“等价交换”无关，只与社会平均的资本构成和平均的利润率水平的决定因素有关。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有机构成不过是生产价格平均化的一个因素，而生产价格的平均化，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交换间的“平等”，而不是资本交换间的“不平等”。相反，只有从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才能说这种交换是“不平等”，是高构成资本“剥削压榨”了低构成资本，是低构成资本“进贡纳税”给了高构成资本（何其伟大的高论）。——也就是世界体系论者所说的“不平等交换”。而事实上，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只能在垄断和非垄断之间去寻找，而不能在高构成和低构成之间去寻找；也可以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之间去寻找（如让渡利润——但这实际上也是垄断的一种形式，不过不是产业资本的垄断，而是非生产部门的垄断罢了，如商业垄断、金融垄断、知识产权或品牌垄断等等），但不能在产业资本各部门之间的构成差别中寻找。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的所谓“不平等交换”，要么是对马克思生产价格平均化理论的错解，要么是对列宁垄断资本理论的劣解。在前者的情况下，它把资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错误地归结为有机构成的高低；在后者的情况下，它虽然承认垄断才是资本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但此时，它关心的重点仍然是不平等交换，而不是垄断本身，垄断在它那里只是用来解释不平等交换的工具，而不是要予以关注的核心。相反，对列宁而言，重要的是垄断本身，至于交换的不平等，那不过是垄断后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还是及其次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终究是一种关于“交换”的抽象体系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生产和垄断的理论，它要么是关于交换的错误理论，要么是关于交换的极其浅薄的理论。但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成为井冈山同志理解世界资本主义及每一资本主义的“钥匙”。他怎么理解呢？不过是根据“有机构成”、“不平等交换”、“在交换中榨取剩余的国家”（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进入垄断之前，仅仅因为它要大量进口外国国家的原产品，就被井冈山同志认定为榨取

了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从而有半外围的中国一方面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一方面又要向核心国家输送剩余的高论，他就不想想，半外围的中国能够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开始）、“在交换中贡献剩余的国家”、“所有参与交换的国家”，推论出“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推论出这些类型的固有本性或固有矛盾甚至是固有宿命（核心强大、外围落后、半外围冲突激烈且脆弱易突破），推论出这些类型之间的固有关系模式（依附与被依附、需要与被需要、一方出钱一方出枪、本质上是不会违背根本利益的命运共同体等等）。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的是错误的的不平等交换原理和抽象的、刻板的固有类型体系。

（2）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既有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该理论的一套固有类型，很简单地就能把中国归属到“半外围”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半外围”的典型特征，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半外围”的主要矛盾。

那么，“半外围”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a.妥协性、买办性、依附性、软弱性，——这很好理解，毕竟不是“核心”国家而是“半”外围国家嘛。奇怪的倒是核心国家似乎就不会妥协、买办、依附、软弱。

b.剩余价值有限性，或利润挤压性，——因为“半”外围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处于输送剩余价值的地位，所以半外围国家就不可能像核心国家那样掌握充足的剩余价值，一方面能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一方面又建立有效的、稳固的、高超的统治/机关。

c.统治脆弱性，——综合以上各因素，说半外围国家统治脆弱，也是顺理成章，奇怪的倒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帝国主义国家竟能没有统治的“脆弱性”，莫非它们只有统治的“强大性”和“巩固性”吗？（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体系理论关于固有类型和固有特征的独断论特点，既然一种特点为半外围国家所特有，那就不会为核心国家所特有，因此弱者极弱、强者极强，妥协者极妥协、强硬者极强硬，一方的特点以另一方的绝对反特点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必胜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必败主义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狗熊主义为前提。对于此种独断论的逻辑，我在后文中还会集中揭露。）

总之，“半外围”资本主义就是妥协的、买办的、依附的、软弱的、剩余有限的、利润挤压的、统治脆弱的，中国属于“半外围”，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也就是相同的特征。这就是井冈山同志的“半外围论”，也是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判断。

（3）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他的“半外围论”，自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利润挤压的危机、利润不足的危机，或者说，是利润率受挤压的危机，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方便起见，就称其为“利润率危机论”。

在这里，无论是对“生产过剩危机”，还是对“利润率挤压危机”，井冈山同志都有他“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生产过剩危机=工人消费不足的危机=工人力量弱小、资本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工人难以取得胜利的危机；而利润率挤压危机=工人力量强大、资本力量弱小引起的危机=工人容易取得胜利的危机。可见，无论是哪种危机，都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力量强弱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这种“独特”解释并不是偶然，而是为井冈山同志后来的“必然胜利论”服务的，只有把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才能把利用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必然性的结果。毕竟，既然危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造成，那无产阶级又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危机呢？既然无产阶级自己就会利用这个危机，那又怎能不设想无产阶级也会在这种利用中取得胜利呢？所以，利用危机是必然的，通过危机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只要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那么利用危机、战胜危机就都是自

然而然的后续动作。——这也是井冈山同志“必然胜利论”的秘密所在。它和马克思的“必然胜利”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必然只是一种历史趋势，正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灭亡；正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胜利。能动性不是创造可能，而是把可能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必然性。但井冈山同志就不同，他的必然不是无产阶级可能在这次危机中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必然在这次危机中胜利，——理由就是利润率危机是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是无产阶级进行利润挤压的危机，既然无产阶级会造成危机，那它也就必然会利用这个危机、通过这个危机，取得胜利。

与井冈山同志不同，我主张中国的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危机和全面性的危机，换言之，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全面的危机形式不会局限在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过剩上一种，而且也很难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一定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如果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过程，那么单一的生产过剩理论、资本过剩理论、物质再生产的比例失衡理论等，都明显不足。

无论怎样，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这个危机并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动性，但决不是危机的主要因素，相反，它本身还要以这个过程为转移呢。

综上，抛开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内容不谈（我认为在这里插入大段的危机理论的讨论没有必要，尽管我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认为主要是利润率挤压的危机、是无产阶级强大的危机、也是“半外围”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即中国范围的危机）。

(4) 在如何认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利润率挤压），自然把利润率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认为对利润率的挤压就是最好的、也是最革命的斗争方式。通过利润率的挤压，也就必然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配合“半外围”国家的“统治脆弱性”（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也就必然会出现利润率斗争、地方群众斗争，在统治阶级先开第一枪的条件下，向地方暴动乃至地方割据斗争的转化；继而也就会出现地方割据斗争向全国性政权斗争的转化。因此，利润率斗争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这就是井冈山同志向我们开出的革命前景。

红旗

(5) 最后，在如何认识最近现象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当然认为中国“只是妥协”、“只是脆弱”，从而认为这是对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的最有力的证据。

五、全面评价井冈山卫士的世界观、方法论、写作脉络和逻辑

在了解了井冈山卫士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梳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写作逻辑了。

首先，井冈山卫士在写作之前已经有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方法的出发点不是各国资本主义，不是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不是在各国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总和，在总和规定下重新理解的各国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而是抽象的、错误的、不平等交换的世界贸易原则，是在这种不平等交换的世界贸易原则的基础上构想的“核心-榨取”和“外围-依附”的根本利益共同体的世界关系体系。好像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总和的全部内容甚或主要内容。

这种出发点和世界观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世界体系理论抽象的、片面的理解各国资本主义作为根本利益共同体的相互联系，片面的理解体系中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支配作用和外围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地位，片面的抽象出核心、外围、半外围等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抽象出这些类型的固有矛盾和固有特点，抽象出这些类型的固有关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既然掌握了全球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真理，他就不必再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独立进程，而认为它们天然就是作为体系中的一个螺丝钉而存在的，因而也就能被体系理论所识别、划分、解释、规定。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地发展，积累、集聚、集中，垄断，输入、输出，妥协、反抗，合力、冲突，时而共赢、时而互损，时而我强、时而你弱的生动发展和矛盾演变等等，到了世界体系理论那里，都是“核心-压榨、外围-依附”的刻板公式。

因此，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就成了它脑子里唯一的矛盾论。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进程、阶段演变等，则都不予考虑。例如，管它是从自由转向垄断，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半外围都是半外围，软弱性都是软弱性。所以经典马列主义的理论只是供它类比——错误的类比，而实际上完全为核心、半外围、外围的体系划分所代替。

至此，他先有观点、体系，然后根据这一体系裁剪现象、归纳事实，结果就是开篇的现象描述：中国对外关系活动上的全面妥协与溃败，然后引出它的世界体系观和中国半外围论，最后剖析了两种危机理论、矛盾观、革命方法、革命路线，甚至上升到了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能动性还是必然性的思想分歧上去了。

大的脉络就是如此，下面具体例举《“贸易战”》一文的逻辑神奇之处。

大的脉络就是如此，下面具体例举《“贸易战”》一文的逻辑神奇之处。

1.《“贸易战”》前言部分，作者提问：为什么*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而他本来应该提问，为什么中国会引起美国的贸易战，美国又为什么要打贸易战。首先是美国要对中国打贸易战，其次才谈得到中国对美国妥协。而作者却避开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能看到“妥协”，他看到的也只有“妥协”。“妥协”，这就是他两只眼睛的看到的全部。

2.前言部分，作者问：为什么*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恐吓不了、惩办不了、打压不倒*？——奇怪的倒是，谁又认为官/僚/军/警压制得了、恐吓得了、惩办得了、打压得倒呢？显然，说这种话是装样子，好像他信任人民，而别人就怀疑人民、迷信军警。

3.前言部分，作者最后一问：为什么*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没有想象中的强大*？——这就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翻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里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但就是没有所谓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说垄断资本主义是“强大的”资本主义，那只能在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成果的意义之上才能说。因此，任何真正的帝国主义论者都不会认为帝国主义“很强大”，相反，倒是井冈山卫士从方方面面透露出他对“帝国主义=强大的、难以战胜的”迷信。例如，看看下面这段吧：

红旗

4.在第二部分结尾，作者写道：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这里，“不是伟大帝国”=“可分析、可认知、可削弱、可打垮”；言外之意，“帝国”=“不可分析、不可认知、不可削弱、不可打垮”。每一个字都暴露井冈山卫士对于“帝国=强大=不可战胜”的迷信。

红旗

5.回到第一部分，论述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全面溃败的部分，作者写道：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这段话也是歪曲的集大成。首先，被作为“主要敌人”的不是“企业”，而是“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不是高科技工业企业，而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一般垄断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次，我们判断谁是主要敌人，不是根据他是否要争霸、是否急先锋、是否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是否一定会挑起什么或不挑起什么，一定会怎样或一定会不怎样，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呢？我们之所以说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乃是因为、也只是因为，它们是整个资产阶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或居于统治地位的代表方面。只是因为它们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代表方面，我们才说它们为主要敌人。至于说我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是否一定是急先锋，一定是煽动方而不是镇/压/方，一定是挑动方而不是降压方，一定是强硬不可一世而不是妥协软弱如侏儒，一定是民族性的体现者而不是民族性的叛卖者，那么，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主要敌人的固有属性，而是在每一具体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相反，帝国主义论者不会迷信垄断资产阶级的任何属性，井冈山卫士倒是很喜欢给垄断资产阶级添加各种刻板印象，如垄断资产阶级=强大、自信、蛮横、不可一世、只是民族情绪的挑动方、也只是民族情绪的受益方、只是要不顾一切的争霸、而绝不会怂得像个软蛋。归根结底，对垄断资产阶级抱有如此幻想和如此“期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井冈山自己。

红旗

6. 同样第一部分，谈民族性和买办性的，作者写道：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罪，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革、“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国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就不谈“区别定价”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已经介绍过的十分老套的垄断竞争的手段吧（在国内用高价确保利润，在国外用低价争夺市场；或者在国内用低价压低成本，在国外用高价争夺客户。这样看来，一战前后的各垄断资本都是帮助其他帝国主义榨取本国剩余劳动的买办资本了）。这里，又可以看出井冈山卫士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拿来作为判断资本性质的标准。有无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在他看来，就是买办资本和非买办资本的判断标准。而实际上，垄断资本向来只是“利用”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而不是本身“具有”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当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蛊惑煽动，当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打击/镇压。归根结底，垄断资本在乎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和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冲突，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而只是因为他们之间利益不同。虽然它们在互相争夺的时候，又都会利用这种民族身份和家国情怀就是了（可不要忘记了，不是只有垄断资本的爱国主义，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呢！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垄断资本可并不是十分喜欢的，就像自干五和真正的圣/意之间有着莫大的距离，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之间也是有着巨大的落差的）。可见，迷信垄断资本民族性的人，不是别人，又正是井冈山自己。

红旗

7.第三部分，批判唯心主义-中华帝国主义论的，作者写道：*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井冈山同志的主要敌人是利润率嘛，相比于利润率斗争和利润率革命，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国有企业不国有企业，有啥关系呢？只要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有助于利润率挤压，那么无产阶级都可以“策略性”的支持，而这就叫“主要任务”和“明智策略”。于是才有：*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XL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的高妙结论。

当然，具体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讲中美关系部分，天真地认为“根本利益”=“相互需要”而不是“相互斗争”，“相互和平”而不是“相互战争”。又例如，讲政/权/机/关/的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时候，夸大一面而无视相反一面的独断论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自己去体会吧。

六、分歧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那么，以上分歧的实质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从实质上说，分歧在于：任意一国的资本主义到底是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还是彻底依附于“世界体系”（或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政府性、不平衡性 vs 依附体系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资本主义到底只是脆弱性，还是危险性与脆弱性兼备？马列主义者到底是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从而要求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还是主张对利润率的斗争就是革命斗争从而认为党的作用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识形态夸大或主观能动性的夸大？

分歧的理论意义在于：用错误的出发点、错误的理论原理、错误的体系构建、错误的生搬硬套全面歪曲和偷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对当下资本主义的个别和全局的理解。

分歧的实践意义在于：用经济主义、必然主义、地方主义、自然而然的尾巴主义、想象成功的乐观主义全面代替列宁主义。

七、分歧的物质基础

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低迷、发展中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都会在新兴的产业资本国家的无产阶级分子中引起对本国工人运动的无限崇拜。

这个崇拜可以产生自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不敢超前于现有的或可能会有的工人运动一步，小心翼翼的跟在工人运动的后面。或者是，主张工人运动的无限意义，宣称这个运动必然导致资本危机乃至资本毁灭。

前者立足于工人群众还很不成熟、非常落后，难以接受更多、更高和更复杂的东西。后者

则立足于工人阶级非常强大，它的斗争直接具有革命意义，而且是那种决定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革命意义。

如果以为经济派只有前一种而没有后一种，那就大错特错了。比起悲观保守的“落后经济派”，这种乐观激进的“革命经济派”至少还显得稀奇和有趣。

因此，落后经济派和革命经济派在本质上、策略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理论外衣和意义假定。落后经济派的理论外衣是唯物主义、条件主义，革命经济派的理论外衣是半外围论和资本主义脆弱性（那些不属于世界体系论的革命经济派通过另外的方式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以便证明在资本主义脆弱的条件下，鼓励改良就具有鼓励革命的直接意义。）二者都践行经济主义和群众主义的尾巴策略，所不同的只是前者认为这具有“准备”革命的意义，而后者认为这具有“直接”革命的意义。前者认为在漫长的力量积累以后方可有向更高阶段的政治斗争的转化，后者则认为在直接革命的不断“挤压”之下，转化必然是向地方暴动和地方夺权的转化。——区别不过于此，干的事完全一样，只是说法和赋予的前景并不一样罢了。

因此，分歧的根源也就不过是经济派的根源，而且是经济派中特有的革命经济派的根源。不管这种革命经济派如何想象自己的理论源泉——即好像是某种思想导致他成为某种人物——事实上都是因为他某种人物，所以才会接受这一或那一思想。那么，革命经济派到底是哪种人物呢？不过是落后国家工人运动中对本国工运感到特别痴迷的那些人罢了。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具有革命意义，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就是在进行革命斗争，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就能决定该国资本主义的存亡与生死，它的运动直接就是必然走向胜利的运动。至于为何如此，所需要的理论解释一大堆，有的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借助于中国“世界工厂”的特殊国情。有的求助于半外围国家剩余价值不足，有的求助于世界工厂产业人口太大。归根结底都是三个字：脆弱性。于是得出工人运动具有直接资本主义命的意义。

因此，革命经济派的现实基础不仅是落后国家工人运动中的一般落后分子，而且更是这一落后分子中的盲信痴迷分子。一般落后分子只会保守、怯懦、固守落后，不会把落后说成是先进、伟大，顶多把落后说成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只有盲信痴迷的分子才会用革命点缀落后，用直接革命的高调来掩饰自己实际行动的狭小。

八、结论

综上，我认为：井冈山卫士的思想观点，只是以世界体系理论为门面，以革命、必然、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辩证、人民力量等高调为装潢的，现代经济主义的新变种罢了。

孤胆精英还是人民英雄？——评何宇同志的危机和斗争理论

作者：井冈山卫士（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昨天激流网发布了何宇同志的《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一文。该文批判了《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的破产》，认为我在文章中的观点是“现代经济主义的新变种”。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目前左翼队伍里的一些状况，这些同时也是何宇同志理论的中心。我们就来讨论下这些问题。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从“全面结合”到“很难说”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最大特点是“全面性”，尽管他自己也说自己“没这个本事”作“全面论述”，但是他仍然指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全方位的或全面的”，不是一国的局部的，而是各个政治社会关系领域矛盾的总爆发。与之相适应，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的核心是“结合”，是合法非法、党与群众、一国与世界的“结合”等等。

漂亮的总结，这是我们看待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起点。当今中国任何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无论是“中帝论”的还是反“中帝论”的，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不过，此番争论的两方都讲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强了还是弱了，是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危机如何**具体地**爆发，即**突破口**在何方。而何宇同志的“全面”和“结合”只不过是把双方都承认的起点再说了一遍。

那何宇同志的“全面”、“结合”的危机理论说了些什么呢？何宇同志讲“**我**（这里值得加个粗体，何宇同志——井冈山卫士）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何宇同志在承认自己“没有本事”的前提

下，在“抛开危机理论的政治学内容不谈”的情况下，竟然像教皇一样颁布了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理论的死刑：**教条和片面**。

何宇同志颁布死刑判决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对，按照何宇同志“全面”的理论，危机还可以是山洪海啸、彗星落地、列宁降世、红光蔽天。所以何宇同志把他学到的所有关于危机的词汇都列举完毕之后，来了句“**很难说**”中国的危机是“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因此，要“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分析。对，**很难说**这是山羊、绵羊还是藏羚羊，只要说出它既有可能是山羊，也有可能是绵羊和藏羚羊就好了，而且还要指出那些根据自己的考察认为这是山羊、绵羊或藏羚羊的同志是**教条和片面**。这就是何宇同志“全面”危机理论的力量所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格局要求我们寻找危机的突破口，而不是泛泛地谈论危机。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利润挤压说和与“中帝论”相关的消费不足说都是对具体突破口的探索。只不过前者认为危机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后者认为是无产阶级弱小而已。何宇同志尽管列举了他经济学宝库中的大量具体词汇，但是一个“很难说”就把他打回了抽象的幻境。但是，仅仅指出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不去具体研究矛盾的规律，只是循环播放矛盾的存在是不够的，因为危机理论是与斗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前者的回答决定了对于后者的回答。何宇同志既然认为危机“很难说”，那么他对未来阶级斗争图景的判断也只能是“很难说”。因此在一片漩涡混迷之中，有什么人能克服（何宇认为的）运动客观规律的“很难说”，征服“大错特错”的同志们，为革命插上定海神针呢？

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落后”的群众与“先进”的小列宁们

何宇同志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反感，尤其认为那些认同工人运动，认为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学习，认为知识分子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同志是“落后的经济主义者”。然后他毫不吝啬地用“保守、怯懦、固守落后”、用“必然主义、地方主义、自然而然的尾巴

主义”、用“错误的出发点、错误的理论原理、错误的体系构建”来宣泄对这些同志的不满。何宇同志认为，应当是知识分子“要求”无产阶级组织为政党，从而领导阶级斗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本身成为历史潮流并让知识分子加入进来。如果要完成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那么无产阶级一定是落后的、保守的、怯懦的，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则一定是先进的、果决的、勇敢的。这是何宇同志“很难说”的危机理论能导出的唯一剧本。

何宇同志的不满来自哪里呢？一句话，来源于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剧本走。他的不满来自于在他认为的“很难说”的前景下，中国工人运动居然挤压了利润，居然能在未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较大的困境，居然能从经济斗争前进为政治斗争，居然能涌现出未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居然能成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他的不满来自于中国经济危机不仅**不难说**，而且正在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尤其是目前这种觉醒和斗争多数不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的，相反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太多；他的不满来自于**今天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先进的工人领导着落后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相反**。塔吊司机罢工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卡车司机罢工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取得了一定成果野火烧不尽的老兵斗争也不是知识分子领导，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工资份额上升利润率的全局性变化更不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对何宇来讲，落后的、保守的、怯懦的群众竟如此大逆不道，竟让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暴露了出来，而不需要知识分子去教育他们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如此抢镜，殊难忍受。

那么，现实世界的发展为什么造成了工人阶级走在前面，知识分子走在后面的局面呢？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大国的中国，需要一个庞大的制造业无产阶级队伍的存在，这就将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拉到了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是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要完成对这些产业工人的管理和协调，同样需要培养一大批各级管理人员，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教育的遗产，另一方面由于扩大现代工人阶级的需要，中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年轻无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截至现在，中国每年高中毕业人数已经与高等教育录取人数基本相当，即 21 世纪出生的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人民群众不是革命知识的荒漠，而是革命斗争的土壤，今日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

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也正是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收买工人贵族，也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收买小资上层。因此，就算是改良的斗争，也不会被资产阶级吸收成为软化斗争能力的手段，而只会成为直接激化阶级矛盾的导火索。何宇同志看到“改良”、看到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就恨得牙痒痒，殊不知今日中国的改良和经济斗争只会收紧资产阶级头上的绞索，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我们正视中国的阶级斗争现状，不是“崇拜落后性”，而是发现突破口，这自然与“很难说”的原则指导下的何宇同志差别甚大。

何宇同志用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来批判我们只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一直强调任何革命理论必须回答无产阶级由弱到强的问题，革命精神如何变物质的问题，如何用无产阶级的武器打倒资产阶级的武器的问题。在《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破产》的第三部分，我们一直在探讨怎样实现阶级力量的强弱转化，尤其是从剩余产品、政权和财政方面，即唯物主义的方面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一刻也没有忽视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事实，因此我们不会去在没钱没枪没人没地盘的情况下去和资产阶级争夺什么工会自由、言论自由、建党自由。因为现在即使资产阶级在法律上给我们这些自由，在执行的时候照样会收回，就像它从未真正给过资产阶级宪法中的那些自由一样。何宇同志，如果你要的是法律上的自由，那么你绝不会享受到这自由，如果你要的是握在手里的自由，你就必须有政权来保卫这自由。如果没有政权，法律给的自由是虚的，如果有政权，你也不需要法律给你这些。（何宇同志的这种观点在老左派、造反派等的论战中，属于“二次革命论”，有兴趣可以向他们虚心请教）如何掌握政权，哪怕是地方政权，是一切追求真自由的革命同志必须思考的问题。它只能来源于对危机确定无疑的而不是“很难说”的回答，它只能来源于对资产阶级弱点和突破口的分析，而不是泛泛地讲“危险性”，只有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解答这些问题。“中帝论”和何宇同志的“全面”论都做不到。

让我们回到何宇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尽管事实一再否定、而且越来越无情地否定他的观点，他还是要指责我们是“经济主义者”，即指责我们开出的革命策略是跟在工人阶级尾巴后面的，这是因为他和一些类似观点的同志一直想要走到群众的前面、掌握群众（这很好）、领导群众（没问题），但是他搞错了历史条件。列宁时代，俄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工业人口只占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很早就接受了欧洲先进国家的革命理论，而广大劳动群众一方面没有经过革命本身的教育，另一方面科学文化素养有限。这就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起当时俄国的农民运动更加进步，更能代表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这是不“难说”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列宁用革命的“灌输论”来解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落差。列宁认为，不能让党落到人民群众的水平，而应当让人民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党的斗争水平显著高于人民群众斗争的水平，而不是相反。而在今天的中国，当人民群众斗争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并能在未来造成积累危机的时候，而一些知识分子居然还认为人民群众“保守、怯懦”，资产阶级强大又危险，尤其是在危机问题上还有人支支吾吾“很难说”。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即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水平大大落后于实践，中国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斗争水准大大落后于无产阶级。这样，要人民群众服从这些知识分子“进步”的领导，只能是把人民群众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只能是拖人民群众的后腿，起到事实上的反动作用。无视当今中国阶级斗争现状，是对列宁同志“灌输论”的曲解，而在此基础上还要给人民群众灌输“很难说”的理论，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破坏。

结论：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

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方式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即明确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明确了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向无产阶级学习，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脱离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斗争理论势必造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脱离。同样，以“先进”自居的小团体和小列宁们也无益于解决革命后如何解除旧分工、如何实现大民主的问题，即使他们成功（他们当然无法成功）也会迅速地蜕变为官僚集团和走资派。只要某些同志还抱着高人一等的态度，试图用实现政治自由的空话来糊弄人民群众，他们就永远

走不出小宗派团体的圈子，无法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样，这些小宗派团体也会因为年轻写手的出现而重复内斗分裂的趣事。表面上看，他们是积极写作积极论战的小列宁，实际上，他们一不理解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二要夸大自身主动性作用。只要他们不敢讨论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和怎么胜利，只要他们总是重复这也可能那也可能，他们就不能理解列宁同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以，他们是只能用其激进话语构筑的“强力意志”来冲破自己也不觉得能战胜的“永恒轮回”的小尼采。他们恐怕并不在意革命能否胜利，他们在意的是能否压过邻班、邻系和邻校的其他小尼采们一头。于是在拿不出除了“很难说”以外的理由时，他们就只能通过谩骂“错误”、“落后”乃至“狭小”来堆起本校小列宁的威望。

以上就是我对何宇同志文章的意见，我们从不给人轻易地下定论，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何宇同志可以从错误思想中走出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

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作者：井冈山卫士（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中国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最近在左翼各界引起了争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帝论”的同志和朋友又不约而同地从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寻找答案。据我所知，目前就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过系统性讨论的同志有远航一号、贺春生、寒流急/话实、清源等，其中前两位同志不赞同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后两位则肯定中帝论。不过，目前尚未有人从《帝国主义论》的定义出发，**使用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决定性的而不是案例研究式的**证据证明或证伪这一观点。本文就来填补这个空缺。

本文意在说明，**无论从垄断程度，资本输出的规模和回报，还是中国“瓜分”世界的能力来看，中国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文章第一部分回顾列宁时代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第二部分探讨中国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第三部分研究中国的资本输出，第四部分讲述中国的武装力量投射；第五部分讲中国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和当今世界金融资本发展的特点；第六部分是结论。

第一部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同志列举了当时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 第一，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 第二，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
- 第三， 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第四，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
- 第五， 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超乎寻常：

“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红旗网评论员和尚）

其中，国有企业集团是垄断的主力军：

“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话实）

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话实）

最后，中国已经有实力，并且正在挑战美国的军事权威：

“中国已经派军舰到中东去打击所谓的“索马里海盗”；它已经派武装力量到湄公河“联合”巡逻去。”（寒流急）

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列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中国至少占了垄断、资本输出和与其他大国争霸和瓜分世界三条，所以，就算没有中国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入融合以及中国垄断世界市场的确凿证据，假设他们是正确的大约也无伤大雅。因此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的世界是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是一个处在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谁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妄议革命导师的光辉论断，谁就是“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谁就是没能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谁就是“赶不上”人家美国的马列毛小组“七年前的认识”，谁就是“中国的考茨基”，所以是天字第一号的“悲哀”（根据红旗网编者的说法）。

尽管我们反复请求这些同志重新审视今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但为了有说服力起见，我们还是要严格地对照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结合全局性的统计资料，定量地说明中国不是列宁版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二部分：垄断和国企垄断

列宁同志对垄断的定义是严谨且完整的，即生产的集中，或者说少量的企业占据行业内产值或利润的大部分，同时垄断企业构成诸如托拉斯等垄断同盟，共同瓜分垄断利润。列宁同志的定义是宏观经济指标，是反映集中水平的全局，与世界五百强中中国企业数量这种局部数字不可同日而语。列宁指出了如下几个反映垄断程度的例子。第一，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占企业总数 0.9% 的工业企业占有蒸汽马力的 75.3%，占有电力的 77.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7 卷 332 页），蒸汽马力和电力是不变资本中的代表性部分，这个垄断率反映的是总产值的垄断水平；第二，1909 年美国工业企业的 1.1% 占有 43.8% 的产值（同上，第 333 页）。从全局看，列宁同志认为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程度约为全部产值的“差不多一半掌握在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里”，同时这些企业中的巨头结成垄断同盟，采取直接的价格、产量干预等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一个是体量指标，一个是行为指标，一个都不能少。

今日中国的垄断水平如何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总数 2.54% 的大型企业占有主营业务收入（概念上相当于产值）的 37.7%，占有利润总额的 37.2%，即占中国工业企业数量 2.54% 的大企业其垄断水平还要低于一百年前占美国工业企业数量 1.1% 的大企业的垄断水平，更远低于占德国工业企业 0.9% 的大企业也的垄断水平。这还只是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如果把全部的工业企业都算在内，中国工业企业的垄断程度还会更低。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

那国企垄断水平如何？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 20.6%，私营企业占 35.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1.6%。首先，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远超国有控股企业，这与一些自由派（以及“中帝论”者）呜呼哀哉的“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相去甚远；其次，我堂堂“中华

帝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率还不如外资企业，简直是奇耻大辱；第三，这也是规模以上工业的数据，由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现在的国有控股企业基本都是“规模以上”，如果我们把“规模以下”的企业也算进来，这个比例会更低；第四，今日中国的“国有控股”，不是国营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甚至不是国有资产占 50% 以上的企业，而是国有经济成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算作“国有控股”，甚至还有国有成分不大于其他成分的“协议控股”；第五，这还仅仅是工业，还没考虑农业和服务业。从全局看，兑了好几次水的“国有控股”企业不过才占了中国国内工业经济总量的两成，看到这幅景象，任何关于国企垄断一统天下的神话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具体行业看，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总数一半的，在 41 个工业行业中占 7 个。其中能源开采和加工占 3 个（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开采辅助活动 1 个，公用事业 2 个（水和电力），外加一个制造业性质的垄断行业（烟草）。根据列宁的定义，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垄断企业需要结成垄断联盟，执行至少是相互协调的价格——产量政策、**获得超额利润才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性质的企业**，否则没有垄断行为和不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在积累速度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并无区别，自然不具备帝国主义性质。而这需要总数为“一两打”的企业形成有执行力的同盟关系，这种垄断企业的联合，与国有控股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份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而言，在 41 个工业行业中，只有烟草行业和石油行业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就在这七个可以说是“国企垄断”的行业中，煤炭开采、电力和开采辅助活动的全部或部分都涵盖在解除外资限制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俗称 22 条）中。那么，中国的”帝国先锋“——”垄断国企“靠什么征服世界呢？靠石油开采和加工吗？中国是石油进口国，靠不得；靠水的生产与供应吗？除非把水厂和水管都建到国外；**那看来只有一个工业行业可以符合国有控股、垄断的定义并且有机会争夺世界市场的，它就是中国的烟草行业。**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志：吸烟有害健康。

阳和平同志在其《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已经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资产阶级调集全力发动“贸易战”反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为此，他还列举了研发支出比例和论文数量的数据。那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垄断状况如何呢，“中华帝国主义”的科技精英们是否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统天下了呢？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约为 10%。其中，可以被看作是高新技术行业的仪器仪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制造业中国企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4%、8.7%和 7.8%；外资占比则分别为 27.5%、56.8%和 23.3%。**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计算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一半以上控制在外资企业手里。**因此，就算是中国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并没有改变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计算机行业受制于人的窘况。

无论是大企业的垄断水平，还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水平，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垄断水平，都否定了中国是一个国企垄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说法。

第三部分：中国的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资本输出，列宁认为，由于垄断资本在本国投资无法获得足够利润，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27 卷 332 页，粗体是笔者加的）。因此，资本输出不是为了耀武扬威，彰显大国气派，而是为了获得高利润。根据列宁同志的论述，我们可以给帝国主义国家订下这样一个定量门槛：**第一，其在国外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要大于外国在该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全部看作是可以获得高利润的帝国主义投资）；第二，其海外资产收益率要高于外国在该国资产收益率。**一个体量指标，一个性质指标，不满足第一条，无以说明投资规模，不满足第二条，则无以说明其投资的利润水平。

那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即帝国主义性质的海外资产约为 5766 亿美元，同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存量约为 9493 亿美元。**外国在华的帝国主义资产远超过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当然，一些人认为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很快就会超过外国在华帝国主义资产，因此中国走在通往帝国主义的道路。这些朋友们要失望了，根据统计公报，2017 年中国对外帝国主义式的投资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跌幅将近三成。现在**中国在外帝国主义式资产的增速已经慢于外国在华帝国主义资产的增速，两者的绝对差距正在拉大。**

不过，中国的海外总资产数目是不少的，2016 年末中国拥有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这是多年贸易顺差的累计。同时，外国在华外汇储备约为 410 亿美元。同年中国获得海外投资收益 1984 亿美元，支付外国在华投资收益 2634 亿美元。经计算，2016 年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约为 4.54%，同年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约为 14.59%，**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超过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的三倍。中国对外总资本输出的利润率明显小于外国对华总资本输出，甚至小于国内以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一般利润率。**中国对海外的资本输出并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成为规避本国工人运动、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国国债等低回报率资产的形式存在，导致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不能成为获利丰厚的帝国主义投资，反而成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其国内经济政策乃至对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低成本融资的大礼包。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明证。首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降**，2017 年仅有 144 亿美元，约占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到 12%。其次，中国并无能力保护一带一路所属工程，每当目标国家政府换届，往往对这些工程翻脸不认人，中国政府，尤其是军队，对其无可奈何。**这样的资本输出是帝国扩张还是赔本赚吆喝，各位同志心中自有分寸。**

从全局看，中国的资本输出，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安全性，都没达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

第四部分：中国的“殖民争霸”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行为，以及世界和中国的整体军备发展状况，我们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的破产》，以及《现在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吗？》两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无论是就世界资产阶级整体还是中国资产阶级这个局部而言，世界大战都不是可选的政治选项，也不是它们正在执行的政策。曾经坚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阳和平同志，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结局的可能性不大”。

新世纪以来局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虽有发生，但是无论是烈度、规模还是发动侵略的国家所得收益来讲，又要明显小于二十世纪。如果我们把发动或派正规地面部队参与对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并打赢战争初期的正规战斗（毕竟就算是美国也没打赢过占领区的治安战）当作新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的话，那么当今之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国家有如下几个：美国发动了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英国参与了上述两场战争；德国参与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法国干涉过马里内战；俄罗斯则于近年出动地面部队、空军和航空母舰直接干预了叙利亚内战。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宁所指出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自战后以来尚未直接参加过对外侵略战争。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仅至今没有跨过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和飞机在我国领海周围甚至以内游弋和挑衅也只能装聋作哑。

一些同志们认为，中国在吉布提设置首个海外基地是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明证。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吉布提基地的问题。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的行为是为了对该国展开政治控制，扶植亲己方政府，借以维护本国资本在该国的利益。

因此世界上只要驻扎有美军的国家，在政治上都在美国的卵翼之下。中国的吉布提基地能否起到此种功能呢？中国军队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主要负责为中国海军和维和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员额约为 300 人。如果中国要对吉布提展开殖民侵略，就要打败吉布提军队。吉布提陆军约有 16000 人，编有一个装甲团、六个步兵团以及炮、工、化、通、后勤等支援单位。如果“中帝论”者认为非洲军队不配当对手，我“战狼雄师”揍他们如砍瓜切菜的话，那么吉布提还驻扎有更带劲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非洲之角”战斗群（员额 3500 人）、法军第五海外合成团（吉布提陆军两个步兵团由法国军官指挥）、日本海上自卫队吉布提基地（员额 600 人）、意大利国家补给基地（员额 300 人）。一些人看到中国在吉布提设置基地，就惊叹中国的帝国扩张势不可挡，但是他们不曾料想，就是在吉布提这个地方，中国在各大国的“军事股份”中还排不上号。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中国在海外设置的维和部队也是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维和部队维护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一般秩序，并非破坏该秩序的帝国争霸。如果要把维和部队也算作帝国主义性质的驻军的话，那么吉布提的 16000 陆军中，有超过 2000 人在索马里和苏丹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照这么说，“吉布提帝国主义在东非”是个比“中华帝国主义在吉布提”更值得研究的话题。

无论从参与或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从海外军事据点的规模和作用上讲，中国都不是一个参与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五部分：垄断同盟瓜分世界市场和金融寡头控制国家

列宁同志指出，随着商品和资本输出，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开始瓜分世界市场，在帝国主义时代，主要表现垄断托拉斯对有“最新技术成就”的产品市场的瓜分。这种瓜分不仅表现在市场份额，而且表现在参与瓜分的各方形成价格——产量同盟，共同获取垄断利润。当今世界，可以通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只有一些少数企业可以掌握的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可替代程度极低的自然资源行业。同时，列宁在举例的时候，指的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某个行业的垄断，而是一个资本家联盟在某个行业的垄断，而且也包含控制

价格等垄断行为。在当代，农业、采掘业、一般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本国出口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故所能拿到的技术垄断租金和资源垄断租金微乎其微。同时，即使某一国的产品市场份额较大，只要它不能通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收益（这需要国内出口商形成同盟并且国外无替代可能性）、或者无法控制产品所需原材料的产地、或者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那么这种“垄断”是不具备帝国主义意义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美洲殖民地的棉花、可可、糖类和贵金属。**如果不能获取垄断租金，“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世界打工仔”的另一种叫法。**当今世界只有两个行业可能形成这种垄断。一个是石油行业，石油生产国组织和最近成为观察员国的俄罗斯控制了世界石油生产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石油生产可能增量的几乎全部。**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增减产量协议来大幅调整石油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中国不在其中。**另一个行业是高科技制造业，即通过核心技术专利获取垄断租金的制造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共向他国缴纳知识产权使用费239亿美元（相当于中国货物和服务总顺差的12%），同时从国外获得知识产权使用费不到12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承诺了一系列保护外国知识产权的政策，其中一部分已经付诸执行。**从全局上讲，中国不是一个掌握核心技术并从中获得垄断租金的国家，而是一个在压力之下愿意缴纳更多垄断租金的国家。**当然，有人会说，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份额那么高，世界少了中国产品就不能活，这还不是帝国主义？没错，在封建社会，农民的产品遍及社会，少了农产品谁也活不了，但是我们能说农民是“垄断的帝国主义阶级”吗？中国每年向国外净输出相当于5000万劳动力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比作阶级社会的话，中国确定无疑属于被剥削的阶级。从中国输入到别国的超额剩余价值，构成了这些国家“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工具。不掌握民众、剩余产品和武装的政权是花架子政权；同样，**无法实现垄断行为、不掌握垄断租金和没有实现租金的必要武力的“市场份额”只是待宰的肥猪而已，这就是“中兴案”的教训。**

列宁论述了金融寡头的形成和其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列宁认为，这不仅仅是同一金融资本范围内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深刻矛盾，而且也为无产阶级通过掌握银行进而掌握工业、掌握生产资料、进而实现计划经济指明了道路（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劳资妥协等对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摆脱了消费不足危机。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和一些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国家对特定产业的扶持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在拉美国家和新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央行加政策性银行加国家扶持的企业深入结合，共同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摆脱依附地位的样板政策。**就金融行业本身来讲，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银行集中程度还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都不低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能说大政府、中央银行和进口替代就是帝国主义吗？果真如此，那么当时的拉美国家、埃及和印度就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了。这不仅是对客观现实的无视，也是对毛主席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策略的污蔑。**

第六部分：结论

从严格的列宁定义出发，中国不具备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需的垄断水平、资本输出水平和军事殖民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远不是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龙头；中国资本没有能力通过瓜分世界攫取垄断利润；金融寡头的形成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在当今时代也不是衡量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从全局看，中国不符合列宁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四个，而最后一个帝国主义特征已经成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国不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

关于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它取决于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强弱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那么，现今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简单地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进攻到了顶点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打击并开始站稳脚跟反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各个帝国无限强大可以指哪打哪不必付出任何成本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忧不断、人民群众逐渐觉醒、世界霸权退缩的时代；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当今时代是无产阶级从被动挨打转入战略相持并开始局部反击的时代。

“大棋党”推崇“中华帝国主义”，是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得到相对稳定待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在国有控股或私营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要么是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部门近些年来由于出口带动的快速发展和薪金的上升构成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结的物质基础。但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需要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无法满足他们的民族主义胃口（这需要周围国家大打出手），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很快会烟消云散。

左翼中相信“中帝论”者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一部分同志真诚地希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同时又读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论述。因此在情感上，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也当在不远。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他们认清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需要、也必然不会经历帝国主义这个阶段时，他们就会回到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另一部分同志尚未从民族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往往抱着这样想法，即“就算革命不能胜利，中华帝国主义只要胜利也是不错的结局”。他们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无法满足他们“小确幸”的生活。但他们在推销“中帝论”上表现并不积极，在政治上的危害并不明显。

最后一部分同志并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所不能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成本的、纪律严明手段高效的钢铁政权。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有枪能打死人、有钱能收买人、还掌握着仿佛可以消解一切革命斗志的消费主义文化，而劳动人民则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反复被异化、被统治、被愚弄。远航一号正确地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这些失败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一些人钻进了后现代的话语迷雾中，试图通过构建革命的“合法性”来回避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一些人则鼓吹中国法西斯粉墨登场，资产阶级统治铁腕将碾碎一切进步力量；一些人则只能做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易水悲歌之态，去为他们也不认为能胜利的事业牺牲成仁（万幸这些同志并不能吸引专政机关的火力，因而还没有机会真正牺牲）。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不知道批判的武器怎样变成武器的批判，不知道革命的理论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民心、武器、财政和政权，不知道革命理想如何成为革命道路。对于他们来讲，胜利只是个遥远的梦幻，因此“运动是目的，结果则无关紧要”，因此革命是飞蛾扑火，不是愚公移山。**在他们看来，革命是热血、是艺术、是激情的迸发，但现实世界的革命却是计算、是战术、是物质的对抗。**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指的就是这种没有前途的“革命”观。

在国际斗争问题上，他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随意“人为地制造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打世界大战来消灭生产力，保障资本主义长治久安。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的行动是有成本的，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错误的决策在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的今天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相信帝国就是扩张，美国会扩张，中国也会扩张，不扩张就会死，却不懂得帝国扩张的极限。他们是中国左派队伍里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只知进，不知退；他们在初等经济学的考试里也拿不到 60 分，因为他们只知道“效用最大化”却不知道“预算约束线”；他们是自助餐厅里饿得扶墙进、撑得扶墙出的食客，只知道吃却不知道为何吃。在过去，这种唯心主义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观点”，在今天，它表现为“中帝论”者的“谈兵色变”：他们一方面认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瓦解反动军队，一方面又认为战争可以随意塑造阶级格局。胜利吧或许可能，失败呢也说不准，

反正结果是不确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啦。这种观点无法将革命向前推进哪怕一步。今天的革命所需要的，不是能幻想“美好的明天是可能的”哲学，而是可以回答“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哲学。

纵观这些年左翼队伍里“中帝论”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有趣的轨迹。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在此时，“中帝论”者认为中国是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和日本的合体，即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有效撼动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者；当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后，“中帝论”多数把中国比作是一战以前的德国，即就算无法摧毁当前世界体系，也能在自己一带一路的势力范围独步天下；而现在，当看到各地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内残外忍的投降路线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破产时，他们则开始申辩“当年沙俄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何不算？”。**从天下无敌，到一方豪强，到甘当沙俄，最后甚至用美国打我是看得起我，别国还不配被打来论证中华帝国主义。**“中帝论”者类比野心的逐渐萎缩，反映着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在以他们不能抗拒的必然性，压倒他们对中国现状的错误认知。而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礼，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迷惘、走向强大并必然会走向胜利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局部的胜利去证明“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主要参考资料：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

太平洋的风（2018年7月，无产者评论）

红色中国的文章《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帝论”》继续红色中国公众号否定中帝论的观点，是该系列文章中最新的一篇力作。这篇文章一改之前从世界体系论出发的套路，回归马列原著，用《帝国主义论》中的论述来衡量中帝，指出若干标准均不符合，从而挖掉了中帝论的根基。笔者认识的许多中帝论支持者都表示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截止当前，还没有反驳文章出现，恐怕从反面说明了这篇文章的理论力度。

笔者算是中帝论的支持者，基本认同马列毛论坛很早以前提出的二流帝国主义的观点。对于红色中国的观点，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些严肃的对话。所谓严肃，就是不能歪曲对方的观点，并且基于事实和逻辑来进行讨论。

针对造二代同志在文章里提出的若干论点，我们准备逐一进行讨论。这篇文章先谈一下垄断的问题。

列宁说，“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显然，如果能证明中国的垄断水平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的水平，那么至少从逻辑上讲，就否定了“中帝论”的基本前提。因此，红色中国文章立论的关键在于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文章作者造二代引用列宁关于写作《帝国主义论》时美国和德国的垄断水平，并与中国当前的垄断水平做对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列宁指出了如下几个反映垄断程度的例子。第一，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占企业总数0.9%的工业企业占有蒸汽马力的75.3%，占有电力的77.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332页），蒸汽马力和电力是不变资本中的流动部分，这个垄断率反映的是总产值

的垄断水平；第二，1909年美国工业企业的1.1%占有43.8%的产值（同上，第333页）。

“今日中国的垄断水平如何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总数2.54%的大型企业占有主营业务收入（概念上相当于产值）的37.7%，占有利润总额的37.2%，即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2.54%垄断水平还要低于一百年前美国工业企业数量的1.1%，远低于德国工业企业的0.9%。这还只是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如果把全部的工业企业都算在内，中国工业企业的垄断程度还会更低。**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

（粗体字为原文作者所加。造二代：《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帝论”》）

关于这段论述，我们认为造二代的分析过于粗略，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列宁分析德国和美国的垄断水平时，用的大企业在所有企业中的规模占比。而造二代分析中国时，采用的数据却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大型企业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这种对比显然不合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分析全部企业中的大企业（并不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大型企业）的营收占比。

我们先看看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经济普查（2013年）的统计结果，我国工业单位总数为2409533个，主营业务收入为1138348亿元。

1-A-1 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行 业	企 业 单位数 (个)	资产总计	实收资本	主营业 务收 入	主营业 务 税金及附加	从业人 员 (万人)
总 计	2409533	1051993.43	250674.08	1138348.34	17925.31	14025.80

企业总数 2409533 个。那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共多少个？规模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看下图。

	企 业 数 (个)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亿元)	资 产 总 计 (亿 元)	员 工 数 (万 人)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中 的 大 型 企 业	9806	418215.09	419709.73	3415.17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中 的 中 型 企 业	55708	247068.24	207021.79	3042.08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中 的 小 型 企 业	304299	373376.13	244019.55	3334.22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总 计	369813	1038659.45	870751.70	9791.46

(原图表太大，上图为重新制作图。读者可自行查询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jjpc/3jp/indexch.htm>)

可见，大型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中数量占比为 2.65%，跟造二代中引用的 2016 年的统计数据差不多。但是，如果把规模以上企业中的大型企业的数量跟全部工业企业的总数相比，那就只有 0.41% 了。拿这个数据来分析垄断水平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分析全部工业企业中最大的 2.5% 的企业，也就是 6 万个企业左右，可以发现，基本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大型企业（9806 个）和中型企业（55708 个）总数相当。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一共为 665283.33 亿元，占全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58.4%。六万多个企业，占了 240 万个企业总营业收入的一半多，而资产总额也占到了全部企业的近六成（59.58%）。

造二代同志有可能不同意上面的算法，因为我们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中型企业也算在了大型企业里面。但我觉得这种算法并非没有道理。

列宁在列举德国大企业时提到，“在 3265623 个企业中，大企业有 30588 个，只占 0.9%。在 1440 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 570 万，即占 39.4%”（《帝国主义论》）。也就是说，当时德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平均雇员数为 186 个。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中型企业的雇员数是 546 人，接近当时德国大型企业平均雇员数的 3 倍。实际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小型企业的平均雇员数也达到了 265 人，比列宁时代德国大型工业企业的人数还多。

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实际上都算是比较大的企业，门槛是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15%，而其营收达到全部企业的 91%，资产是全部企业的 83%，职工总数是全部企业的 69.8%。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和中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18%，而营收占到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64%，而资产占到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72%。中国工业企业的垄断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不过，有可能造二代同志会坚持用美国当年 1.1%的大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 43.8%的比重，来确定中国是否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还是可以简单算一算。

中国工业企业一共 2409533，其中最大的 1.1%企业总数为 26505。规模以上企业中的大型企业数为 9806，也就是说，**最大的 1.1%的企业由 9806 个大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16699 个中型企业组成。**

我们拿不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中型企业的详细数据，只能做一下估算。假定中型企业中全部企业的营收都一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没有数据，只能这样假定），那么 16699 个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应该是 $(16699/55708) * 247068.24 = 74061.04$ 亿元，加上大型企业的 418215.09 亿元，工业企业中最大的 1.1%的企业总营收为 **492276.13 亿元**。而这 **492276.13 亿元是全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43.25%**，跟当年美国前 1.1%的企业的产值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43.8%）相差无几。

实际上，我们的假定肯定不符合实际情况。考虑到整个工业中的集中程度，中型企业中前 16699 个企业的营收，很可能会占到全部中型企业的一半甚至更多，而不是平均估算得来的 30%左右。因此，认为中国工业的程度会比列宁时代的美国更高，是完全合理的。

简短的分析可以说明，造二代同志对中国工业垄断程度的分析过于简单，没能反映中国工业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基于不全面数据而提出的“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这一论断，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根据统计局的经济普查数据，我们认为，**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显然不仅跨过了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水平。**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兼答“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质疑

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井冈山卫士“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和“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两文发表后，已经在马列毛左派同志中引起了热烈的和积极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同志正在认识到“中帝论”的危害，并且开始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不应该机械照搬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若干具体观点，而必须结合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

近日，红色中国公众号转载了井冈山卫士的后一篇文章（标题略有修改）。“太平洋的风”同志读后在《无产者评论》上发表了短评（“太平洋的风”同志误以为原文作者是“造二代”）。“太平洋的风”同志表示自己是“中帝论的支持者”，同时也表示“对于红色中国的观点，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些严肃的对话。所谓严肃，就是不能歪曲对方的观点，并且基于事实和逻辑来进行讨论”。我们赞赏“太平洋的风”同志所表达的这一讨论态度。

“太平洋的风”同志对于井冈山卫士原文中所计算的中国工业企业集中度的一些指标提出了批评，指出如果采用全部工业企业而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则中国工业企业的集中度并不低于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工业企业的集中度。我们对“太平洋的风”所给出的数据和数据来源做了核对，确认“太平洋的风”同志计算无误，“太平洋的风”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正确的。我们在此，对于“太平洋的风”同志指出我们的数据引用不当表示感谢。

不过，我们还是想借此机会与“太平洋的风”同志和其他同志进一步探讨如何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如何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列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阶级斗争具体实践的问题。

确如“太平洋的风”同志所说，在列宁看来，现代帝国主义（也就是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过，“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第411页、第434页）。垄断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产物，但积聚和集中本身并不等同于垄断。如果没有这种差别，就无法区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也无法区别马克思《资本论》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时代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此有所说明：“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第333页）可见，在列宁看来，集中本身并不等同于垄断，而只是造成了垄断的条件。这里要说明的是，井冈山卫士在原文中由于行文仓促疏忽，也没有注意区别集中和垄断，这是应该更正的地方。

那么，什么是垄断呢？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和媒体提供的一些资料，列宁介绍了垄断组织的一些基本特点，那就是，一个或几个行业的若干最大的资本家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形式组成“资本家同盟”，对市场的容量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来瓜分市场、规定产品产量、确定价格等。通过这些垄断行为，一个或几个行业的最大资本家可以大大压低原料的价格、提高售出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垄断形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竞争性资本主义企业受到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统治：“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第342页）

列宁还引用资产阶级商业资料来说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高额利润。以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煤油托拉斯）为例，其1900年的注册资本为1.5亿美元，而1882-1907年的年平均纯利约为3400万美元；年平均纯利相当于注册资本的23%。1900-1907年，该公司平均每年向优先股持有者支付高达43%的股息。

美国苹果公司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垄断企业之一。据苹果公司财务指标，在截至2017年9月底的财政年度，苹果公司的税后净资产收益率高达37%，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21%。

相比之下，再来看一下在很多“中帝论”者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主流媒体看来是中国垄断企业代表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石油”）。据2017年中石油财务报表，该年度中石油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1.9%，销售净利润率仅为1.8%。

再来看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这一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未扣除所得税）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22%、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6%；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1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7%；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不到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5%。

可见，在一些“中帝论”者看来，所谓“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中国国有资本集团（话实，“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崛起”）不仅没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也谈不上“扼杀”和“压迫”私营中小企业，反而仅能得到显著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这些都说明，简单地认定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认为中国的国有资本是当代垄断资本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部分，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垄断企业，特别是在某些所谓高技术产业中，外资控制的一些企业确实得到了高额垄断利润。井冈山卫士在以往的一些文章中对此已经做过介绍。但是，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外国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显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而更像是列宁所说的被帝国主义剥削的“附庸国”的特征。

我们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是为了单纯的经院学术的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实际的阶级斗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明的，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首先是为了说明当时还在进行的帝国主义大战的真实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为此，列宁努力研究了当时“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更重要的，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是为了与当时已经形成的国

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展开斗争并且分析和认识修正主义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列宁指出：

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 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 80-100 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第 329-330 页）

我们请“太平洋的风”同志和所有目前仍然信奉“中帝论”的同志特别注意列宁的这一句教导：“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列宁这里所讲的“这个现象”就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而这一现象的“经济根源”就是作为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的寄生性、腐朽性；这种寄生性尤其表现在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上。列宁特别说明，因为这种超额利润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所以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乃至培养整个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后来的世界历史的事实也证明，改良主义在后来的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都占了统治地位。

“太平洋的风“同志、《无产者评论》的读者同志们、红旗网的读者同志们、激流网的读者同志们，你们赞成还是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呢？如果你们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认为你们确实赞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愿意将其应用于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呢？

如果你们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并且你们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你们又怎能否认你们上述观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

显然，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帝论”是不可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指明前途的。如果还有前途的话，恐怕也不过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的前途。

我们不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未来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碗红豆汤”。我们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像历史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斗争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可以通过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来加以认识的。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外围国家；这种半外围的地位，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从而也就没有培养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是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并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组织准备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日益增长的斗争能力和要求必然要超越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够容纳的范围。这些，在我们看来，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必然要走上革命道路并且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基本历史依据。

“中帝论”的同志们，据说你们是不赞同我们的上述分析的。那么，请问，你们是否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必然要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取得胜利的呢？如果你们相信，能不能把你们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据和道理讲一讲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如果你们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可以强大起来，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取得胜利，你们也不妨将你们的真实的信仰宣告出来。那样，你们至少不失为诚实的人。

“贸易战从何而来”编者按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部（2018年7月）

近来有关贸易战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但如果不去深入挖掘国际贸易秩序背后的互动关系、权力变化，就难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张跃然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如今的贸易冲突根源于新兴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而不论是“挑战”还是“维护”，其行为都根植于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尽管具体政策会因各国政治能动性而不同；不论旧霸主、挑战者们口头上多么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都是根据特定的资本利益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

文章也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十分符合阿瑞吉、西尔弗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霸权转移时的系统性混乱——「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最近，左翼内部对“中帝论”的讨论十分热烈。这篇文章或许也可以为这场争论提供一个视角：世界体系的秩序并非始终稳定、不可撼动的，体系中的各国关系也有着丰富的层面，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如果仅仅以此来看待世界体系，就是把世界体系理论降低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话术。《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原帖已被删除）一文充分批判了这种话术，但可惜的是把丰富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一概否定掉了。

另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是《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其回应了反“中帝论”者们自欺欺人的所谓“论据”。有趣的是，反“中帝论”者还不肯直面现实，又抛出了一篇苍白混乱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令曾经拿着《资本的终结》找李民骥签名的编者哭笑不得、大失所望。

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此文的槽点：1、其论据的蹩脚程度仅需举一例，作者拿 IT 企业（苹果）跟石油企业（中石油）比较销售利润率（21%：1.8%），以此论证中国的垄断国企没有超额利润——连行业差异都能抹杀，这是哪门子的“政治经济学”？李民骢等人怎么不去列举沃尔玛的利润率（2.7%）、壳牌石油（1.9%）的利润率呢？

2、此文的逻辑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李民骢等人口头乐观，实则丧失信心到无以复加；他们连 20 世纪初沙俄的性质都忘记了，居然还来大言不惭地谈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骢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糟点”

远航一号（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近日，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了与“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讨论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答复了“太平洋的风”同志的一些疑问，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一些体会。本来，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欢迎一切同志和朋友积极地参加讨论并提出真诚的批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在计算中国工业企业集中度时，我们只计算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中度而没有计算全部工业企业的集中度。这确实是不恰当的。为此，我们已经对“太平洋的风”同志的批评意见表示了感谢。我们同样欢迎，一切致力于进步事业的同志和朋友继续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包括来自《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批评意见。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没有直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而是将他们的意见躲躲闪闪地表达在一篇编者按中；这篇编者按是为了推荐张跃然先生介绍世界体系理论的一篇文章。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明明是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撰写的；但《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却将全部的批评火力集中于李民骥同志：

另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是《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其回应了反“中帝论”者们自欺欺人的所谓“论据”。有趣的是，反“中帝论”者还不肯直面现实，又抛出了一篇苍白混乱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令曾经拿着《资本的终结》找李民骥签名的编者哭笑不得、大失所望。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同志，苍白也好、混乱也罢，概由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负责。你或许崇拜过李民骢同志，但并没有崇拜过我们，你的“望”是什么，失的又是什呢？

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说不清自己失什么、望什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志在拙文中所发现的“糟点”：

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此文的糟点：其论据的蹩脚程度仅需举一例，作者拿 IT 企业（苹果）跟石油企业（中石油）比较销售利润率（21%：1.8%），以此论证中国的垄断国企没有超额利润——连行业差异都能抹杀，这是哪门子的“政治经济学”？李民骢等人怎么不去列举沃尔玛的利润率（2.7%）、壳牌石油（1.9%）的利润率呢？

看来，李民骢同志不懂政治经济学，还不如《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懂一些，据说还懂得“行业差异”。苹果公司与中石油不属于同一行业，这点常识我们还是有的。但是，即使不与壳牌石油公司做比较，1.8%的销售净利润率实在算不得超额垄断利润；这一点，我们想，就是最精通行业差异的读者也是不会反对的。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解？在介绍中石油的盈利状况时，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们分别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利润指标，一是净资产收益率，一是销售净利润率，并且特别说明了年份和数据来源。《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请问，你们所说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利润率”是哪一种利润率呢？又是哪一年的利润率呢？你们所提醒的行业差异很重要。但是，比李民骢同志更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会不懂得，不同年份的商业行情大有差异吧？

接下来，还有一段据说让《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笑掉大牙”的更大的“糟点”：

此文的逻辑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

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李民骥等人口头乐观，实则丧失信心到无以复加；他们连 20 世纪初沙俄的性质都忘记了，居然还来大言不惭地谈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骥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要感谢《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较为“完整”地引用了一段我们的原文。不过，还有些不大完整，就在上述这段引文之前，我们还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赞成还是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呢？... 如果你们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并且你们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你们又怎能否认你们上述观点的必然推论：”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所引用的那段话，是一个诚实的“中帝论”者，如果他确实接受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且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在左翼“虚拟世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的懦夫，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出发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的结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们，请问，你们到底赞成不赞成列宁的教导呢？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帝国主义就必然意味着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呢？如果承认，那么就请你们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在哪里、有多少？如果你们不承认，而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超额利润仍然可以是“帝国主义”，那么也请说明，“中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哪里，它的附庸国在哪里，或者它的广大的“内部殖民地”在哪里？如果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如当年的沙俄一样，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那么也请不要客气，也不妨像列宁那样，指出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是“最薄弱”的，指出帝国主义大战的条件和必然性、指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必然性，向广大的马列毛同志指出你们的“十月革命”道路！如果你们指不出这样的道路，甚至于从内心中害怕这样的道路，那么不如趁早揭去你们“革命”的伪装！

先生们，革命是危险的事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恐怕不只掉几颗牙那样简单）。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毛经天（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近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转载了张跃然博士对某一本资产阶级学术著作进行总结的文章《贸易战从何而来》。其编者认为，该总结深入挖掘了国际贸易秩序背后的互动关系、权力变化，得出了切合实际的关于贸易战的结论——巴西、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在热情称赞了这篇总结之后，该编者立马换了一张脸，批评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以自欺欺人的“世界体系”话术否定“中帝论”，在该编者看来，“世界体系的秩序并非始终稳定、不可撼动的，体系中的各国关系也有着丰富的层面，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何宇的文章《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充分批判了这种话术，但可惜的是把丰富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一概否定掉了。”

何宇在其文章中宣称，“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

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和何宇都认为，体系是具有“丰富的层面”的，却又吝惜笔墨不肯赐教这些“丰富的层面”是什么，本文就来探讨一下这些东西。

1.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何宇宣称，他的体系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任何具有现代科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复杂系统来说，总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加总。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会在整体层面呈现出部分不具有的性质，并推动系统的演化发展。马克思所讲的价值规律就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各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客观上就将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以满足社会各种需求。何宇后来又在行文中用“在个体

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的词句来否定他先前关于“体系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的论断，这不过反映了他脑袋里的混乱罢了。

何宇声称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却不去说明我们需要考察总和里哪些丰富的内容，只指责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是抽象的排序。这时，笔者不禁要问，有哪个科学理论不做必要的抽象？做任何科学研究，都要抛掉枝叶抓住主干，都要合理地抽象，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一句话，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何宇一定可以理解动力学里把物体抽象为“质点”的理由吧。

既然要批判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那就要说明他的抽象为什么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不能解释当前世界体系的动态发展，而不能像何宇一样说“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自以为说全面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说了和没说一样，毫不利于我们去认识客观世界。

何宇采用这些自相矛盾和违背科学的说法，是为了给他的论断留下空间，即中国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其主要矛盾是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奇怪的是，何宇所批评的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的理论，井冈山卫士所作的分析恰恰是关于薄弱环节的分析，只不过没给何宇的“二次革命论”、“工人群众落后论”留下位置罢了。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希望何宇还能潜下心来学习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总而言之，要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坚持整体论，要说明白各阶级、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这些相互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如何演化发展乃至灭亡。

2.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系统，分析单位是整个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或地区。此外，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必须是系统的和历史的，也就是说

要在系统层面上阐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要说明整个体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路径。

历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分工体系。处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在世界市场上，核心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处于科技前沿的、能够获得垄断利润的部门构成，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竞争性的、科技含量低的部门构成，而半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则兼有这两种类型的部门。因此，剩余价值从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和半外围国家，也从半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国家。享有超额剩余价值的核心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来吸引核心资本（即处于科技前沿的资本），提升产业结构；因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淘汰下来的产业则转移到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这一机制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而剩余价值从外围、半外围向核心的转移，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为体系的关键。

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所推崇的文章《贸易战从何而来》里所引用的阿瑞吉就曾详细阐述过这一机制。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似乎对此一无所知。通读编者按，该编者所声称的“丰富的层面”好像是指巴西、印度和中国经济崛起，摆脱了其半外围的地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了严重冲突。可是，如果他真心推崇那篇文章的每个字句，就应该去了解一下阿瑞吉的学术成果。按照阿瑞吉以人均 GNP 划分核心、半外围、外围的标准，中国、巴西只能是半外围的地位，而印度才刚刚踏入半外围的门槛。

除了剩余价值转移的“主干”外，世界体系理论当然还有“丰富的层面”。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崇对某一本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总结文章，那就不妨去看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Nature 上刊发的关于世界体系的文献综述，毕竟文献综述会更有说服力一点。2018 年 4 月底 Nature 子刊 Geoscience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贸易的环境和社会足迹》。作者列举了多项研究成果，例如：在过去 50 年中，发达国家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被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7 年全球 30% 的 PM2.5 排放是由生产出口品引起的，其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和欧洲；2006 年，中国 4%-8% 的空气污染物是由于生产满足美国的消费品引起的；发达国家将低技能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2011/2012年，印度有100万儿童为生产出口品而工作；美国每年7000万人年的劳动足迹里有4000万人年来自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巴西、菲律宾、墨西哥和中国……不知这些“丰富的层面”入不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的法眼？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远航一号和井冈山卫士已经做出了大量的说明。何宇将他们的世界体系论判定为无用的抽象，“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说其忽略了世界体系的“丰富的层面”，话实则将其视作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翻版。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可以和话实辩一辩，捍卫一下他们的具有“丰富的层面”的世界体系理论。

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专门将《贸易战从何而来》一文中的这个语句挑出来：

“当前的国际秩序十分符合阿瑞吉、西尔弗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霸权转移时的系统性混乱——「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其实，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讨论，从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的解体，就和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有密切关系。运用相同的逻辑，张跃然博士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还可以谈谈那个时候“紊乱”是怎么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了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所谓“混乱”，在中文的正式翻译中应该叫做“混沌”，这是复杂系统理论中关于非线性系统的一个概念。“混沌”并不是说事物发展不再遵守规律而呈现出随机的特点，而是说，系统的发展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而系统是否呈现出混沌的特点，取决于基本参数。随着基本参数的变化，一个非线性系统会逐渐出现分叉现象、然后再过渡到混沌。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基本参数，二是初始条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参数应该是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

和税负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税负成本的上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趋向混沌——中国的崛起在此意义上才能被认为是造成了混沌，而不是中国与美国争霸造成了混沌。因为系统未来的发展路径取决于初始条件，即当前人们采取的行动，因此左翼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对可能的“薄弱环节”进行严肃的研究，以求取得局部胜利乃至最终的全局胜利，而这正是关于“中帝论”争论的关键所在。

早在 10 年前，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所嘲讽的李民骥教授就发表了他的著作《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终结》，探讨中国崛起和世界资本主义灭亡之间的关系。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要进行真诚的讨论，那就不妨取来读一读。

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

壮壮（2018年7月，激流网）

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生产状况。当今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起绝对支配作用，社会化大生产占据绝对优势。这些都没有疑义的，帝国主义的大前提中国已经具备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1]中“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所以最要紧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根据列宁的定义，这对于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帝国主义国家至关重要。

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这篇文章中，“井冈山卫士”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位同志的作品《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2]一文中，才提出了这一决定性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2]中“井冈山卫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业生产中，“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但“太平洋的风”所著《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3]一文得出了想反的结论：“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显然不仅跨过了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水平。”[3]

笔者比较了这两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发现后一篇文章[3]所利用的数据更全面，其计算方法精确度更高，所以结论自然更准确。本来笔者打算用类似的方法推翻“井冈山卫士”的结论，但笔者没有掌握那么详实的数据，“太平洋的风”所做这篇文章远远比笔者文章中关于工业垄断的部分要好。

所以笔者就删去那部分，专门谈谈当今中国银行业的集中与垄断。“井冈山卫士”也知道列宁给出的“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2]包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2]，但他并没有给出中国银行业的统计材料，让笔者抛砖引玉吧。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报》：2015 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 4262 家。[4]根据普华永道 2017 年 4 月给出的《银行业快讯》中的编写说明：“27 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合计相当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76.40%”。

这两组数据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只差了一年，具有可比性。可以认为 2016 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数目大致为四千（很可能低估），这样看来约占总数 1/150（这个比例可能更低）的 27 家大的商业银行拥有的资产超过所有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3/4。

由于大银行业务上的种种优势，它们对业务的控制能力至少不比对资产的占有能力低。一小撮银行控制了整个行业，即使不做任何对比，凭感觉也可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当年银行业是怎样的情况呢？

列宁以某类银行“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银行业的集中”程度。[1]

1912/1913 年间，柏林 9 家大银行占 49%，其余 48 家资本在 1000 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占 36%，115 家资本在 100 万至 1000 万马克的银行占 12%，资本不到 100 万马克的小银行占 3%。资本在 100 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共有存款 98 亿马克，占存款总数的 97%（49%+36%+12%）。[1]

要想把这些数字和现在中国的情况相比，需要估计当时德国有多少银行。

其他资本在 100 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共有 172 家（9+48+115），关键在于估计小银行的数量。当时德国银行的全部存款约为 101 亿马克（98/97%），所以资本不到 100 万马克的小银行共有存款约 3 亿马克（101*3%）。

资本在 100 万至 1000 万马克的银行拥有存款超过 12 亿马克（101*12%），共有 115 家这样的银行，平均每家银行拥有存款略多于 1000 万马克，也就是略高于拥有资本的上限。假定小银行也满足这个条件，每家平均拥有存款与资本上限基本相等，那么小银行就有约 300 家（3 亿/100 万）。

这只是个作为参照的估计，小银行很可能存款更少，所以数目很可能比计算结果明显多一些，比如五六百家。但即便我们假设小银行大概有一千家（应该是明显高估了），那么当时德国银行的总数也不会多于 1200 家。

9 家大银行在银行总数中的占比不会低于 0.75%，0.8%、1% 甚至更高都有可能，但这些银行的存款占比只有 49%，略少于 1/2。2015/2016 年间，中国的 27 家大银行在银行总数中的占比不会高于 0.7%，但存款占比不会少于 3/4。

那时的德国依照列宁的标准来看是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近期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已经明显高于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

根据“太平洋的风”的论述[3]，中国已经具备列宁版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一个特征：“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1]。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特别需要资本集中，考虑到中国已经拥有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这一情况，银行业集中到可怕的程度必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1]。在笔者看来，列宁版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二个特征中国也已经具备。

虽然“井冈山卫士”没有给出中国银行业的统计材料，但这位同志应该知道中国金融资本非常集中，知道集中程度很可能超过某些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关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写的：“就金融行业本身来讲，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银行集中程度还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都不低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能说大政府、中央银行和进口替代就是帝国主义吗？”[2]

“井冈山卫士”忘了，帝国主义的大前提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完备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体系。他提到的那些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那些条件的。在那些国家里，由于殖民体制等种种不利条件的长期压制，本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农业甚至工业中小生产还起着一定的作用，绝不能因为银行业过分集中就认为那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

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大前提已经具备了，加上完备且非常集中的工业体系，再加上集中到可怕程度的银行业，帝国主义的特征多么明显啊！

参考材料

[1]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730-845页.

[2] [井冈山卫士.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2018.7.13\].](#)

[3] [太平洋的风.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 .\[2018.7.16\].](#)

[4] 投资圈 mp. 中国究竟有多少银行和银行人？统计清楚了！.[2016.8.13]. http://www.sohu.com/a/110392591_460455

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

远航一号（2018年7月，红色中国网）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们，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呢？

井冈山卫士同志“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发表后，许多同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意见。其中有些，是严肃的、有益的批评意见，如“太平洋的风”同志“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一文；对于其中的一些疑问和误解，我们已经做了答复。还有一些，却是不严肃、不认真的，他们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认清事实、追求真理，而更多地是为了让真理服从自己。对于这些不严肃、不认真、有害而无益的批评，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和毛经天同志也分别做了答复。

激流网是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进步网站；长期以来，红色中国网与激流网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直是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以往一些批评我们的文章，激流网转载了，但并没有首发。我们对于“中帝论”的批判文章，激流网并没有转载过。对此，我们是理解的。这次，壮壮同志批评我们的文章，则是由激流网首发的。想必，激流网编辑部的同志对于壮壮同志的文章是完全赞成的，而对于我们对“中帝论”的批判则不完全赞成。如果确实如此，建议激流网的同志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将你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壮壮同志的批评文章题为“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壮壮同志的主要观点是，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已经高于二十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的垄断程度，因而足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井冈山卫士同志这两天比较忙，受井冈山卫士同志的委托，我来答复壮壮同志提出的质问。

壮壮同志查阅了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报》，了解到：“2015 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 4262 家。根据普华永道 2017 年 4 月给出的《银行业快讯》中的编写说明，27 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合计相当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76.40%。”根据这个信息，壮壮网友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总数大致为 4000 家，27 家上市银行占商业银行总数的不足 0.7%，却占到了全部资产或存款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个集中程度，按照壮壮同志的计算超过了德国银行业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集中度（占银行总数约 0.75% 的 9 家大银行占有全部存款的一半）。

壮壮同志能够主动做调查研究，查阅银监会资料，这是好的。但是，壮壮同志的调查研究不够仔细，下结论又过于匆忙马虎，以至于忽略混淆了一些金融业的基本概念。在2015年底，中国确实有426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这比壮壮同志列出的数字少一家，这一微小差别无伤大雅）。但是，壮壮同志，“金融机构”不等于“商业银行”。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银行业各种金融机构数量盘点”，2015年底，在总计4261家金融机构中，计有农村信用社1373家、村镇银行1311家、农村商业银行859家、城市商业银行13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民营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5家。此外另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邮政储蓄银行、货币经纪公司、贷款公司、政策性银行等等，均非商业银行（<http://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60902/14383359164.shtml>）。

如将其中确属商业银行的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相加，总数不过1014家。如此算来，中国最大27家银行占商业银行的总数就不是壮壮同志所认为的不足0.7%，而是2.7%了，其集中度也就未必高于二十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了。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中，井冈山卫士在说明中国工业的集中度时，研究不够仔细，仅研究了少数大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例，而没有研究大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例。“太平洋的风”同志指出了这一错误。令人遗憾的是，壮壮同志没有从井冈山卫士同志的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在没有搞清楚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两者之间区别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得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实在是太恐怖了”的结论，犯了与井冈山卫士同志类似的错误。所以在我们看来，壮壮同志应该向“太平洋的风”同志学习，学习他严肃、认真的讨论作风，努力做到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而不要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就像毛主席说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

在与“太平洋的风”同志的探讨文章中，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资本积聚和集中只是造成垄断的条件，但是集中本身并不等于垄断。关于集中和垄断的区别以及垄断的标准，除了可以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外，我和井冈山卫士同志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做了进一步说明。

仅仅就集中来说，正如马克思、列宁都曾经论述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不仅一些公认的、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一般的外围、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行业的资本都达到了高度集中。但是，银行业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情况。比如，在林毅夫、章奇、刘明兴合著的“银行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发表于《世界经济》杂志2003年第1期，第3-21页），表2.1列举了四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1989-1996年银行业资本集中的情况。按照各个国家5家最大银行占银行全部资产比例来计算，埃及的5家最大银行占该国银行总资产

的比例为 73%，希腊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91%，印度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51%，肯尼亚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72%，巴基斯坦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90%，秘鲁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76%，菲律宾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56%，津巴布韦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97%。相比之下，德国的 5 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 39%，美国的 5 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 20%。如果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简单的根据银行业集中度来认为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秘鲁等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德国、美国反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那岂不是十分荒唐？

那么，在列宁看来，到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算做帝国主义国家呢？壮壮同志（像很多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一样）引用列宁的著名语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但是，列宁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和语境下做出这一论断的呢？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的前几段，列宁是这样讲的：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 ...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壮壮同志，各位坚持“中帝论”的同志，请你们认真地看一看列宁自己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定义，虽然“能包括主要之点”，毕竟仅仅是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仅仅是为了“简短”和“方便”才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那么，列宁明确讲，“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列宁还特别指出：“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在我们看来，列宁的这一教导，对于批判当今中国左派中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是特别有意义的。

只是在做了上述说明以后，列宁才列举了一般人们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但是，许多不细心的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即使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看来，也

仍然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尤其是不能够适应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需要的。因为，紧接着，列宁又进一步指出：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

所以，在列宁看来，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还必须给帝国主义再下一个定义，否则就仅仅是注意到了“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那么，列宁认为应当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列宁用相当的篇幅来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明确地再提出帝国主义定义的问题。

然后，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的开始部分，列宁指出：“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 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在这一章的中间部分，列宁特别指出，正是这一“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即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和修正主义派别）的存在有着直接的联系：“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

这种帝国主义“寄生性”的物质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垄断高额利润”，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可以用这些“垄断高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可见，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瓜分世界”，就是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高额垄断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这些，都不是井冈山卫士或者远航一号的发明，而是见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白纸黑字。

在后来列宁亲自撰写的《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的第五部分，列宁又特别强调了第八章的重要意义，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接下来，列宁再次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大量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是如此

重视这一问题，以至于他特别指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我和井冈山卫士同志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中，特别提醒同志们重视列宁的这一教导。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同志，不仅不重视列宁的教导，而且对列宁的教导以及我们的说明加以肆意的歪曲和捏造。

现在，我再次请同志们重视列宁的上述教导。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具体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将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在列宁逝世前一年所撰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事实上已经明确指出，未来世界革命的主要希望不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的东方：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一丝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在列宁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自身里的“成熟”来实现，而是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就是说，只有世界广大东方的人民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那样，东方的革命才能为西方的革命展开道路。列宁接下来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在世界东方被压迫人民占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才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当然，正如列宁所说的，“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只有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会无视生动复杂的社会实际，而用僵硬的定义来裁剪现实。就列宁所处的时代来说，沙皇俄国就不完全符合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方面（即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大量超额利润）也不典型。列宁与斯大林对沙皇俄国社会性质的有些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比如，斯大林曾经认为，由于对英、法资本的依赖，旧俄国实际

上带有一定的“半殖民地”性质（相关史料见，阮大荣，“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一期）。

列宁认为，沙皇俄国尽管在经济上较为落后，但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沙皇俄国通过对东欧、中亚各民族的征服而占有了广大的殖民地。按照列宁的计算，1914年，沙皇俄国的宗主国部分仅占沙俄总面积的24%，而殖民地部分占沙俄总面积的7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公开的殖民地已经很少了。我们判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主要根据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一般的、主要的特征，即其垄断性和寄生性，以及由垄断性和寄生性所决定的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剥削所形成的“高额垄断利润”。在这几个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疑似帝国主义国家）是否通过对外政治和军事干涉而控制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剥削和压迫若干个附庸国，是否发动或参与过多起对外侵略战争等。如井冈山卫士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中所论证的，以上几种情况，都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将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若干基本特征中个别的一个两个，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完整定义中机械地割裂开来，硬套在中国现实上，不仅无助于马列毛主义的进步，而且正如列宁所说，将使得我们“一步也不能前进”。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属于世界的“西方”或者将要属于世界的“西方”（这是“中帝论”不可避免的推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仅中国的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将是没有保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是属于世界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那一部分，那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论断仍将是完全正确的。

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们，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呢？